

·百家丛书·

DE73/25

# 绿灯小集

邵燕祥

人民日报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6784

1106784

封面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张炜天

· 百家丛书 ·

# 绿 灯 小 集

邵燕祥

\*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

787×960毫米 32开本 印张5.25 字数83千字

1987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书号：10132·066 定价：0.95元

# 编者的话

《百家丛书》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愿把这份精神上的礼物，奉献给一切关心改革、思考改革和从事改革的人们。

本丛书定名为“百家”，是取“百家争鸣”之意。本着这一宗旨，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国内专家、学者、作家和各界人士有关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的著述和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著述和作品，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一个小小的百花园和群言堂，使之起到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交流信息，启发心智的作用，从而为党所领导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服务，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我们欢迎各界人士为本丛书投稿；欢迎对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指教。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 目 录

前记·····	( 1 )
岁暮祭书神·····	( 3 )
话痛痒·····	( 7 )
读《儿子》·····	( 10 )
士兵诗话·····	( 14 )
关于苍蝇的联想·····	( 17 )
再说“唤起”·····	( 21 )
〔附一〕说“唤起”·····	( 24 )
〔附二〕也说“唤起”(方放)·····	( 27 )
说“时髦字眼”·····	( 30 )
说开会·····	( 34 )
探索：这是一个崇高的字眼·····	( 38 )
说禁忌·····	( 43 )
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46 )
听歌记感·····	( 49 )
尚未失传·····	( 52 )

论优越感·····	( 55 )
故事和真事·····	( 59 )
就重在朝朝暮暮·····	( 62 )
改革万岁! ·····	( 65 )
也谈“隐私权”·····	( 69 )
《雾失楼台》:一首电视诗·····	( 72 )
说“低沉”·····	( 74 )
世无完人论·····	( 78 )
公款私用论·····	( 82 )
未能免俗·····	( 86 )
似曾相识话顾荣·····	( 89 )
两件小事·····	( 92 )
春风吹不掉错别字·····	( 95 )
国格与家丑·····	( 98 )
说嚼蜡·····	(101)
幽默辨·····	(103)
西施故里篇·····	(106)
〔附〕西施出诸暨(高逸)·····	(109)
当代可以入史·····	(112)
说“后生可畏”·····	(115)
春末漫笔·····	(119)
车祸与人祸·····	(122)
读《艺海沉浮》·····	(125)
晚说了三十年·····	(129)

《三国》一锦囊.....	(132)
小议死后之事.....	(136)
人咬人.....	(139)
咬文嚼字.....	(142)
标签.....	(146)
今天里的昨天.....	(149)
“粉碎”和“彻底否定” .....	(152)
漫谈“经典” .....	(156)

# 前 记

昨日立秋，今天便觉新凉。想起辛弃疾那首有名的《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两种境界，我都有经验。而两者偏都是写杂文的大忌。杂文，杂感文也，有感而发，不同于无病呻吟的舞文弄墨，怎么能无愁“强说愁”？既然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为什么王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呵呵呵”呢？与其不痛不痒，还不如什么也不说。

杂文都是自己要写的，没哪个强迫你。一不能卖钱，二不能邀宠，倒是肯定会得罪人，树敌招忌。但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无声的中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作者群，难道在今日中国，天籟人籟之间，就不需要杂文，就不需要杂文作者

的条分缕析，指陈时事，以至嬉笑怒骂、呼号呐喊之声了吗？

不需要的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需要的只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多年来主要是兴之所至，写些抒情小诗。近来，特别是从一九八四年初至今，转而多写杂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能对社会生活及时作出反应，能把我和群众的一些思考、情绪、意向直接加以表达的形式。自然不是无病呻吟，而且即使是面对某些客观存在的弊病和精神领域的锢疾，也是谋求疗救，而不出以呻吟的。

至于有时意思失于浅，是思想水平所限，看得不深，并不是故意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敷衍读者。总之，我说了我想说的话，“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这里收的杂文，多是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所作。

邵燕祥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



# 岁暮祭书神

鲁迅年轻的时候，在一九〇一年初即旧历庚子年除夕，写过一篇《祭书神文》。这是千家万户准备礼拜财神的时候：“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作者欢迎那被人间冷落的书神，驱着囊鱼驾的车，到笔海、文冢之间一游，“绝交阿堵（钱）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作者和书神一样鄙视金钱，宁肯召唤书癖和诗囚来作伴，“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这是少年鲁迅天真的雅兴。当时他很难逆料三十多年后会写出“文章如土欲何之”的吧。

岁聿云暮。面对着架上少量历经劫难的残书和近几年重新添置的图书，又喜又忧，谈不上百感交集，却还是有些感触。

从全国来说，一九七六年出书一万三千种（这里面有好书，当然也不乏帮腔帮调的），以后是一万五，一万七，一万九，两万一，逐年增长，

到一九八四年是三万五千九百多种，总印数达到五十亿册以上。这在十年前怕还是不敢想象的。尽管我能买的书、能看的书有限，可在出版物的品种、印数、质量都在提高的趋势下，我买所欲买、读所欲读的愿望和需要必然可以得到保证。这怎么不叫人高兴？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起，我就听说出版事业告急。据说新华书店拒绝预订许多著作，或者订数很少。在“征订包销”三十年一贯制的制约下，新华书店预订数不足，出版社就难以开印，甚至难以发稿。许多家出版社因而压缩了文学艺术、科技专业、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出书计划。有人预计，把已经发稿的书在两三年内出齐以后，书籍市场可能出现一片荒凉。如果不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出版是我们科学文化的阵地啊。倘若真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精神文明的建设将遭到多大的损失呢。

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出版事业的低潮，整个文化界、读书界投入了讨论。读者、作者、出版工作者、发行工作者从各方面揭出了钱神冲击书神的问题，批评了在全国有六十多家出版社单纯追求利润，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了一些不健康书刊，以及有不少出版社规定经济收入的指标来考核编

辑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以出书赚钱多少定优劣，等等。在端正出版工作的业务指导思想，并进行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些倾斜可望很快纠正，有些积久的问题也可望逐步找到解决的途径。

在不由自主的忧虑之后，我对前景还是乐观的。不过想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想到书神如何不为钱神左右，我心里仍然感到不够落实。

归根到底有个钱的问题。

出版工作，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应该经过改革改善经营，力求节约开支，并在可能条件下创造利润。然而，向作为文化工作部门的出版社，跟向经济工作部门的生产企业一样，要求上缴高额税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怎样才能更符合党中央关于文化事业没有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的指导思想，也更有利于在出版工作中“以丰补歉”，支持一部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优质图书的出版，并促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繁荣。

我于财政经济，如同于出版工作一样外行。可听了一些出版界朋友议论他们的苦衷，也觉值得同情。现在谈出版工作的社会效益多，认为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出版部门也要讲经济效益”，一般虽只是一笔

带过,但是经济效益的指标却是硬任务啊!除了寄希望于适当降低对出版社的财政经济要求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我想不出。这是需要身在改革实践中的出版工作者来研讨的。

作为一个读者,一个爱书的人,在岁暮祭书神之际,馨香祷祝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比翼腾飞,我们社会主义的钱神招财进宝,并给书神以援手,使出版事业度过危机,一片兴旺,使我们家家的书架,处处的书店,新书好书,与日与时俱增!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

《载一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

# 话 痛 痒

动了一次手术，也许是影响了神经的机能吧，五官之一的舌头，有半边麻木了；这是事先预计可能发生的，手术前已经签过字了，不说它。刀口附近的部位，至今时而隐隐有痛感，痛当然不舒服，可是在手抚着痛处时，从潜意识到上意识，想的倒是，既然还能觉得痛，说明这里的神经还在起作用，乃是一大幸事。

在我身上不曾发生麻木现象以前，听过一个外国笑话：有位老先生总担心慢性病发作，比如脑血栓之类，于是经常掐一掐大腿，试试自己的感觉有没有故障。这一天正在饭桌上，他忽然大惊失色地宣告：“我的腿麻木了，掐上去毫无感觉。”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太太说：“你掐的是我的腿！”

医生可以从疼痛来诊断疾病，而象局部麻木本身，也已经是一种感觉障碍，更不用说可能是

某些重病的症状。那位外国老先生的惊慌完全可以理解。

因此，是不是可以说，能知痛痒（痒是微痛），总比麻木强。

过去说到革命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常引用鲁迅说的话：“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神经麻木了，必然也就无所措手足。今天，我们的作家不仅应该知自己的痛痒，而且推己及人，应该体会正经历着历史的蜕变的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改革者的痛痒，全体人民从不同角度介入的四化事业的痛痒，并且把这种痛痒通过各种形式写出来，不仅自己不能麻木，还要使麻木者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投入伟大的实践。“感应的神经”就这样感受着时代的脉搏。社会主义文学是激发人的热情、振作精神的文学，又是使人保持清醒、摆脱麻木的文学。这如果不是文学的唯一的、也该是主要的功能吧。

四十年代初从贵阳狱中传出过一位无名烈士的遗诗，其中有一句：“相关痛痒见交情”。一切同命运、共患难的同志和朋友，都是休戚相关、痛痒相关的。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之所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最不可缺少的，最可宝贵的，就是这种与从事建设、改革的现代化大业的普通人休戚相关、痛痒相关的感

情：正如同所有的干部，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与群众休戚相关、痛痒相关的感情，才可能被承认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干部一样。

那首无名烈士诗的全文是：“走尽崎岖路几程，寸心原欲救危倾。黄花寂寞锁深院，浓雾弥漫罩古城，忍受折磨堪砺志，相关痛痒见交情。劝君正向光明面，心自安详气自盈。”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

（载二月九日《光明日报》）

## 读 《儿 子》

整整四十年前，从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林陵等同志译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的介绍中，得知有阿丽格尔写卓娅和安托柯里斯基写儿子的两首长诗，渴望一读（后来知道这两首诗先后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前者，五十年代初以《真理的故事》为题译介到中国来了；而后者，却直到今天才见到智涛同志的全译本。回想四十年代中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读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诗歌时那种激动、悲愤、钦慕、向往交织的感情，恍如昨日。我比安托柯里斯基当年悼念的生于一九二三、阵亡于一九四二的儿子小十岁，而现在我的年纪已经比诗人遭遇殇子之痛时还要大好几岁了。岁月如流，时间真是不饶人的。多少伪造的历史被纠正，多少伪装的面具被揭穿，多少矫饰的甚至只是平庸的作品被淘汰，而象《儿子》这样近千行的、基本上并无什么情节的长诗，仍然使我如面



对诗人，听他倾诉，这种艺术力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这个秘密，还是留给文艺学家、诗评家以至接受美学的研究家去探索，去回答吧。在这里，我只想向有如诗人夭折的爱子那样年龄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读者，向所有的诗歌爱好者和诗歌作者们推荐这部长诗《儿子》。

这部长诗是诗人为悼念他的儿子、英勇牺牲的烈士弗拉基米尔·帕甫洛维奇·安托柯里斯基少尉而作；然而这又绝不仅仅是一篇悼亡之作。

从诗人的一首题为《再谈诗人和时间》的短诗里，我们知道，是在一个简陋的农舍，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诗神削好笔尖，悄悄对诗人说：“你别睡了，快拿起笔，写下你孩子成长的过程。”

诗人的神思在儿子和自己之间，在战前年代儿子由襁褓而上学、而毕业、而休假旅游直到应召入伍的回忆和战火硝烟、别离和废墟的现实之间，在苏维埃祖国和法西斯强盗所从来的国土之间，在亲人与敌人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往复地徘徊，急骤地飞驰，这就形成诗篇的时空交错的结构。

在诗人的心目中，历历如绘地浮现了和平时期和战争环境中一椿一椿事物，一幅一幅景象，无不带着或使人眷恋、或使人感奋、或使人惋惜、

或使人悲痛的感情色彩，这就使诗篇从始至终充满着饱含爱憎哀乐的细节和意象，使读者如闻如见，唤起强烈的共感与和鸣。

诗人的笔聚焦于儿子的身上，并没有对三十年代的苏联作广阔规模的描绘；诗人在第三章中对那杀害了自己儿子的法西斯强盗的父亲之质问和诅咒，也凝聚着作为丧子的为人父者的诗人之个人的伤痛和愤懑。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抒写的典型性，不仅赋予诗中的生活图景和感情、心理图景以普遍性，而且赋予这部以抒情为主调的长诗以史诗的意义。

我猜想诗人在构思和写这部长诗的过程中，忍受了感情的燃烧和知性的思辨相交替、相错综、相助长的煎熬。因此长诗中的亲子之情、爱国之情这样震慑人心，但又是有所节制的，无滥情之病，而且最终超越了个人的感情世界，从对儿子的短暂一生的回顾和哀挽进入关于人生哲理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对于诗，我虽然也算一个多年的习作者，但更多地是一个读者。我爱读好诗，读好诗常常能激起自己写诗的愿望，也常常引起自己向别人推荐的冲动。

五十年代初期，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读到智涛同志译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初学拍马者的

指南》。不久以后，我曾经袭用这首诗的思路，以自己的闻见为基础，写了一首也是楼梯体的讽刺诗《拍马须知》。在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风暴中，这首未发表的诗稿也成为导致我被划入另册的罪状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此案了结之后，我曾经多次打听智涛在哪里。不期而遇了，我见到了智涛同志，但是并没把这件往事说给他。今天遵嘱为他所译的《儿子》一书写一篇小序，情不自禁地把这段因缘向读者公开。这只是再一次说明，我只能写些闲谈偶感的文字，至于对作品的鉴赏、分析，上升到理论，则远远不能胜任了。

然而，我坚信，再过若干年回首往事时，我之向读者推荐这部长诗，将不再引起题外的不快的回忆。时代不同了。今天的和将来的读者都会作证：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安托柯里斯基的长诗《儿子》，由智涛同志全文译介到中国来，是对诗人的深情的纪念，也是为当代中国诗歌更全面地取得借鉴作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而我此刻愿意再一次表达对诗人及其力作的真诚的敬仰，并对译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

# 士兵诗话

在边防战士中涌现了许多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悲壮的诗歌，广为流传，不少人写文章已经说到了。我在这里要说的却是我翻检未定稿时找出的自己一首旧作《士兵之歌》：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说什么/“不想当元帅就不是好士兵”/心中没有人民的，不是好士兵/心中没有祖国的，不是好士兵/心中没有理想的，不是好士兵/好士兵想的是/为人民/为祖国/为理想/不怕牺牲/想一万里漫长的边境/想两万万个温暖的家庭/想母亲的叮咛，未婚妻的嘱咐/想明天的战争，今日的敌情/也有人只盯着勋章和绶带/只盘算着几条杠杠几颗星/“闹个师长旅长”，馋着元帅将军/当上了元帅还想飞升……/这号人今后还有没有？/根本就/不配称作/人民的子弟兵！

这首粗糙的诗写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回想当时是由于在五月号一份期刊上读到一首《我

向往成一位将军》，思想上很起了一番波澜。

在那之前，我就听说有人用“不想当将军的就不是好士兵”来教育青年立“大志”。当将军也罢，当元帅也罢，总之这是一位已经当上军事统帅的外国人留下的格言。格言总是有普遍意义的吧，但是一推而广之，我就碰壁了：难道能说“不想当团中央书记的就不是好团员”，“不想当党的总书记的就不是好党员”吗？

但是，引用格言作如是说的，偏又是颇有影响的名人，我于是困惑了。

接着，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讲述青年战士郑跃的思想发展过程的长篇通讯《从马丁·伊登到马克思》，其中提到他的中学同学黎三涛，就是这则格言的信奉者。三涛在一九七八年考取北京一所大学后，给只考上中专的郑跃的临别题词，就是“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

这样的价值观，在一段日子里还能给黎三涛以支撑，他说：“这几年，我已经顽强地走过来了，今后，我要顽强地混下去。”而这并不能给他认识自己和认识生活的真正精神力量。他终于从“几年来的苦闷实在无法解脱”，发展到“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也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一九八〇年秋自杀了。

不能把黎三涛之死完全归咎于这一句外国格

言，但这句格言至少助长了他的盲目性，促使他陷入以某种个人意愿为中心的迷阵而不能自拔。

一个士兵是不是好士兵，一个青年是不是好青年，怎么能以他是否向往重权高位作标准呢？这句格言不就是中国封建时代所谓“鸿鹄之志”的海外版吗？按照这句格言的逻辑，林彪似乎不但是“好士兵”，还是“好元帅”了。

因此，当我读到《我向往成一位将军》那首诗时，情不能已，随手写了《士兵之歌》。写完后没有投寄报刊发表，是以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写一篇有分析、有论证的文章，会比一首短诗更具说服力。而这样的文章却是我写不出的。

时间过了一两年，生活实践作出了最雄辩的回答。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青年战士，各条战线上抱有高度自觉的先进的价值观的年轻人，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青年是好青年，什么样的士兵是好士兵。我不必因自己这首诗中缺少精警透辟的论辩而藏拙了。

我们会有众多的好将军，好元帅。我们将有为数更多的，千千万万的好士兵。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载一月十七日《中国青年报》，改题《立什么样的志》。）

# 关于苍蝇的联想

故发奇论以哗众取宠，贬损名篇以自抬身价，都是鲁迅当年指斥过，至今也还有人奉行的“文坛登龙术”。《光明日报》副刊一月十九日发表的《战士与苍蝇》一文所批评的，一篇把鲁迅作品付诸“一扫”的奇文，就是一个样品。对于这类与科学不相干、以骂倒为能事的所谓对鲁迅的再评价，鲁迅倘在世，怕不会用正眼相看的。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然而，在这里，那自鸣得意地营营叫的苍蝇既不见得完美，也并没有曝住战士的什么缺点；充其量不过在不朽的花上留下几点蝇矢而已。

沾上蝇矢的花终竟是花，沾在花上的蝇矢也终竟不过是蝇矢。

鲁迅生前身后遭到的诋毁，有来自敌对阵营的，也有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撒在鲁迅作品上

的蝇矢，则既有“土”苍蝇的，也有“洋”苍蝇的。鲁迅的高明，就在于他从来不因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毛病，就认为外国的月亮格外地圆，同时，他更从来不因外国也有苍蝇，就看不到“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鲁迅“五四”前一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新诗中，有一首《他们的花园》，说一个小娃子望见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他弄到一朵如雪之又白又光明的百合：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鲁迅诗中的小娃子，在“他们的花园”里首先看到的是好花，而不是苍蝇，倒是这好花拿回家里才沾上蝇矢——自然是“土”苍蝇而不是“洋”苍蝇的。鲁迅活画出那时冲破封建的藩篱，到广大世界上去寻求真理、寻求民族出路的一代青年，没有这种寻求，“他们的花园”中的科



学与民主，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都不会自己来到东土的。

但是，“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就是说，有“洋”苍蝇越关而来固勿论矣，即使进口的是百合花，也往往会被封建的蝇矢所玷污。

鲁迅多次沉痛地揭示过，——就如科学这朵花吧，——到了一些人手里，地质地理学被利用来为“风水”作证明，优生学被利用来为“门阀”作辩护；而那把现代思想视同洪水猛兽的遗老们，并不拒绝现代物质文明的享受：麻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多打几圈。……诸如此类，借“西法”以为“国粹”之助，到头来，使“百合花”也“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妙处了。

“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在一九三四年这样大声疾呼过。

是的，比起五十二年前，现在苍蝇少得多了，当然，并没有绝迹。在防范从开放的窗口逃过检疫偷飞入境的“洋”苍蝇同时，也要注意蝇营狗苟的“土”苍蝇，它们会在多少本国的、外国的鲜花上留下蝇矢，给多少食品带来致霉致病的细

菌，直到使多少崇高庄严的事物因之而声名败坏。

所以，要紧的不是严“华夷之辨”，而是必须严格辨别战士与苍蝇，鲜花与蝇矢，前进与倒退，开放改革与抱残守缺，为人民群众还是为一己之私。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载二月二十四日《羊城晚报》）

## 再说“唤起”

几十年前人们所痛心、所诅咒的“无声的中国”，早已经变成有声的中国。不幸的是，由于历史的回流，神州大地一度又曾经万马齐喑。

万马齐喑是不好的，然而我们要什么样的声音呢？

汉武帝到嵩山，听那山都在向他高呼万岁，并非昏君的武帝刘彻，为什么会这般白日见鬼？那是只听颂声的耳朵产生了惯性的错觉。

如果说音乐只诉诸“音乐的耳朵”，喜听恭维的耳朵只能听到“山呼”，那末，我们若想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就非有善于倾听群众呼声的耳朵不可。

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方放《也说“唤起”》一文指出，在“唤起民众”与“唤起领导”的“互相唤起”之风正在兴起的同时，在一些地方不免还有些残留着过多旧

的“长官意志”的领导者，还不能或不善于倾听大地——人民群众的声音，正触及这个问题。

能不能有善于倾听群众呼声的耳朵，关键系于是否承认必须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要理解和代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才能跟群众一起，并领导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而奋斗。

如果以为一旦身为领导，对群众就天然有了领之导之的权力和能力，只知道行使“长官意志”，而忘记了向群众学习的必要，那必然会自以为是，师长自居，只听诺诺，不听谏谏，听到不同的意见时还可能反问：“难道你比领导还高明吗”？甚至把不同意见等同于反对意见，再进一步，“反对我的意见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领导”，这还谈什么倾听群众呼声呢？

其实，即使是群众中个别人的意见，不仅有时会比领导岗位上的个别人高明，而且有时还会比一级领导集体都要高明。这在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不乏其例。高明的领导者的高明之处，就在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集中群众的智慧，而不高明的领导者则恰恰是对这一点处于“不知不觉”的状态。

因此，“唤起”领导，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唤起”倾听群众呼声，坚持群众路线的自觉，

“唤起”作为人民公仆（而不是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官老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叫人民为我服务）的自觉。

一个先天性的耳聋者，就会成为哑巴。一个后天的、由于种种原因而听不到群众呼声的领导者，就会陷于盲目。

今日中国，已经不再是鸦雀无声。领导和群众“互相唤起”，钟鸣鼓应的局面正在出现；只有保护和发展这种局面，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在意识到历史方向的、焕发出高度历史主动性的人民群众推动下，如江河之水澎湃而东。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载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附一〕

# 说 “唤起”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有幸游历了东南一处奇丽的山水：武夷山。武夷山管理局门前竖着一方指陈当地实事的《毁林纪事碑》，万里副总理很赞许这一做法，认为这说明主事者是有文化的。院里还有一块山石，背后磨平，刻有“爱这片土地这片山林”，该算是正面教育了吧，也不错。细看前面似乎还有几个字，却又被鏊去了。一打听，原来是“唤起民众”，管理局个别负责人以为不妥，下令删掉了。

孙中山先生遗嘱里有过“唤起民众”之说，如果因此忌讳，那是于理不通。或者“唤起民众”只适用于革命建国一类大事，那未免过于拘泥。若说当地民众都已经有了保护山林的觉悟和习惯，无须“唤起”，我看更未必然。也许担心“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不敢以“唤起民众”的启蒙者自居，似乎又太客气了。“唤起民众”到底为什么“不妥”，

碍于情面，到底也没有问。

不过，“唤起民众”是没有错的。我们的一切建设、改革，都是“唤起民众”同心同德一起干才能干好的。无论振臂一呼或是谈心解疑，都是“唤起民众”，而振臂一呼也离不开这之前和这之后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把文学艺术等同于政治动员的时代过去了，然而连文学艺术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唤起民众”，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职责，跟一切意识形态工作者一样，是包含着精神上的启蒙在内的。用“启蒙”两字，绝不是说群众都是蒙昧的愚氓，也不是说负有“唤起民众”责任的领导者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职业家们都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超人。唤人者人亦唤之，醒人者人亦醒之，启蒙者人亦启迪之，教育者也要接受再教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存在并应该发展“互相唤起”的格局。从领导的角度看，领导者要“唤起民众”。而广大人民群众，也无时无刻不在“唤起领导”。这种群众对各级领导的“唤起”，包括对正确路线政策和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的支持、拥护的信息反馈，有感情的表达、精神的激励，也有从实际出发的建设性的建议；同时也包括对于领导工作中错误缺点、偏向和不足之处的批评，对腐败现象和歪风邪气的揭发；这也可以叫作“唤醒”，是提醒，是

警醒，使我们的各级领导者知所惕励，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高瞻远瞩和见微知著的视野优势。不久以前报上发表营口市一名个体商贩写给市委的尖锐批评的信，就这样起到给营口市委也给我们许多人“背上击一猛掌”的作用。“诸公谁听刍蕘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这种旧时代的感叹，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民主的发扬，不复见于今日。中共中央早在建国之初就发布过在报纸上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很好的传统，不仅有助于“唤起领导”注意有关群众利益的群众呼声，及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也有利于“唤起民众”加强自己的主人翁感，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贡献力量。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让“唤起民众”与“唤起领导”并行，让领导之间、群众之间都能兴互相“唤起”之风，则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亲和力与向心力将更加加强，我们的事业将更兴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载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附二〕

## 也说“唤起”

方 放

读了一月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的邵燕祥《说“唤起”》一文，引起我的联想。特别是“唤起民众”与“唤起领导”的“互相唤起”，更有深意。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早已出现了这种“互相唤起”的格局，群众向党反映自己的要求，唤起领导；党倾听人民呼声，根据群众意愿制订方针政策。党和群众，息息相通，政通人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兴旺发达的局面。

这种局面来之不易，人民付出了多少痛苦的代价，经受了多少贫困的折磨才有了今天！就说使农村面貌为之一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吧，确是群众创造，其实，几十年前群众中早就有了这种创造。群众千呼万唤，领导就是不应。一九五七年的拉马退社，一九六二年的“单干风”，几次强烈的呼唤，都没有唤起领导，反而被一次次地“打退”“批臭”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承认

人民的创造，人民终于唤醒了领导，大包干之初，河南人民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折腾二十多年，共产党可算迷瞪过来了！”就是说可醒过来了！

“唤起民众”和“唤起领导”看似对立，实则是一致的。二者并行，互相唤起，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支歌走入革命队伍的。我们唤起民众，也唤起着自己。那时候，党和人民如鱼在水，领导与群众之间，官兵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多么纯朴自然，融洽无间。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延安一次大雷雨过后，民间有人传说“雷怎么不打毛泽东”；有人当作反革命，要追查。毛主席说，且慢，问问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说？一查原来是一个农民因交小米太多，负担过重而发出的怨言。这引起党的领导的注意，以后就多方减轻人民负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可惜，在胜利之后，特别是在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这种倾听人民呼声的好传统没很好坚持下来，甚至发展到令人痛心的地步。一语不慎就招来横祸，不用说“唤起”，一点微弱的呼声也被隔绝了！一个时期，到处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党和人民经历了一段多么痛苦的曲折！物极必反，这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对比耐人深思。倾听群众呼声，坚持

群众路线，对我们这样一个执政党是多么重要。近几年来，喜见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发展，民主发扬，民心欢畅。农村的成功的改革，一年一度的几个一号文件，都是在反复调查研究、倾听人民呼声的基础上制订的。群众的要求唤起了领导，领导的决策体现人民意志。上下贯通，互相“唤起”。广大农村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其源盖出于此。

巨人安泰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指人民群众），党的正确领导植根于群众之中。善于倾听群众呼声的领导者，经常俯身于大地之上，谛听各种声音，甚至细微的小虫鸣声，禾苗的拔节声，都能尽收耳底。正是这些来自大地的声音，使领导者耳聪目明，既见微知著，又高瞻远瞩。“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指的就是这种状况。令人欣喜的是，这种状况在我们国家，在一些领导者中，日益清晰可见。

历史的曲折深刻地教育了领导和群众。“唤起民众”与“唤起领导”的“互相唤起”之风正在兴起，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觉醒，且正在形成一种巨大的动力。不可否认，在一些地方不免还有些残留着过多旧的“长官意志”的领导者，还不能或不善于倾听大地之声。但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相信他们终将被群众前进的脚步声唤醒。

（载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说“时髦字眼”

跟几位老朋友聊天，说到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我们实行“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于是有人慨叹在未来的独生子女世界里，将不知兄弟姊妹、叔伯姑舅、姨妈婶娘为谁人了，深致惋惜，因为汉语词汇在这些方面本来比某些外语为丰富的。

而同时说到现在书面上、口头上出现大量“时髦字眼”，或属“舶来”，或属“生造”，就不免义愤填膺。

其实，“时髦字眼”之出，并不是于今为烈。伴随着每一次社会政治变动或时代思潮激荡，作为交际工具、信息中介的语言必然敏感地反映出来。从“辛亥”前后到“五四”前后，在军事围剿反围剿和“文化围剿”反围剿的十年，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无不如此。有些一度陌生的被贬为“时髦字眼”的新的政治、科学名

词或术语，一下子或慢慢地普及，大家熟悉了，终于进入口语，当然也有淘汰了的。

鲁迅《花边文学·奇怪（二）》（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文，提到有人以“学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为理由，主张叫中学生不要用“许多时髦字眼”，其中有：

共鸣 对象 气压 温度 结晶

彻底 趋势 理智 现实 下意识 相对性  
绝对性 纵剖面 横剖面 死亡率……

这些今天看来远远不“时髦”了，当时还是“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不过用得多了，大家逐渐辨识其意义，也就不会误用、误解了。

鲁迅是反对光是引进新名词却不介绍它的涵义，而各各望文生义的，如以为写女郎的小腿肚就是浪漫主义，不许写女郎的小腿肚就是古典主义等等。然而在这里，鲁迅反对以各种借口（包括“为了大众练习大众语”）来禁用“时髦字眼”，他认为那会使大众中有些人永远模糊；他说应该“给大众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

五十年前，“对象”一词从日语引进不久，还要加以界说、解释；今天不但耳熟能详，并且有了引申出来的意义——虽然我对“搞对象”“谈对

象”的习惯说法是很不欣赏的。但语言现象似乎有某种自发性倾向，有时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翻看一篇幅达四百页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一万余则汉语外来词无一则无来历；从这些来源于日语、梵语、印欧语系各语种和国内外许多民族语言的外来词和古汉语外来词，可以看出中外文化交流之悠久广泛、语汇互相借用之错综复杂的情况。其中特别是从日语汉字转借来的词汇占着极大比重。很难设想从我们今天的汉语中排除象“干部”“关系”“观点”“立场”这些源于日语汉字的外来词。

一种语言要适应社会发展中人们表情达意的需要，不仅要吸收外来词，而且要容纳理论思维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的新范畴。新词汇必然会不断出现，千万不可一概贬为“时髦字眼”加以抹煞。

新词中那些不确切的、不必要的，将会纠正或淘汰。原有的词汇也是一样。

尽管将来的“独生子女”群也许不再运用兄弟姊妹这些概念和词汇，但是请放心，这无碍于他们看懂那反映“长幼有序”的宗法大家庭生活的《红楼梦》；就象我们从优生学的角度反对近亲

（中表在内）婚姻，并不影响我们对宝玉、黛玉这对表兄妹的恋爱悲剧抱着同情一样。

语言的发展变化，比起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来，缓慢得多。但是它也在稳定地吐故和纳新。

面对科学技术、理论思维飞跃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现象纷然杂陈的当代生活，正如我们不能满足于引用经典作家的现成论断，我们也不能囿于经典作家的词典。林彪言必称毛主席，他在文章里引用毛主席语录最多，然而历史证明，这个标榜自己“三忠于”“四无限”，指斥别人都是“反”这“反”那的林彪，恰恰是恩格斯说的那种叫喊得最凶的卖假药的人，并且扮演着“贼喊捉贼”的角色。

不必为应该死去的老词的死去而叹惋，倒是应该对新词汇的涌现表示欢迎。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载四月五日《现代人报》）

# 说开会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开会迷》一诗的结尾写道：“但愿能再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把一切会议扫除干净！”这还了得！他想把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一股脑儿归到扫除之列吗？！幸亏列宁及时肯定了这首诗“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保住这位倒霉诗人免受批评家们的攻击：有那么一类批评家是既会不懂装懂又会懂装不懂的。然而如果不是列宁“偶然在《消息报》上读了”这首诗呢，那诗人在一九二二年当时就提前自杀也说不定。

真得感谢列宁。尽管他说关于诗艺他“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外行”，但他没有因马雅可夫斯基这一句夸张之词就断定作者是个形而上学的、否定一切的妄人，证明列宁不仅是“从政治和行



政的观点”，而且也从艺术表现（包括语言）的特殊性的观点来理解和欣赏这首诗的。

自然，若从讽刺诗挪到生活里，真开一个旨在“把一切会议扫除干净”的会议，让我参加，我是会投反对票的。

如果没有上海望志路一百零六号和嘉兴南湖船上的会议，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怎么设想我们能象今天这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回顾我们走过的漫漫征途，虽然有过象“飞行集会”那样导致牺牲的盲动的失误和其他不愉快的回忆，毕竟有更多公开的、秘密的会议长存在心中：那敌后根据地召唤“男女妇救会、老少年儿童团”开会作抗日救亡动员的锣声，不是依稀响在身边？在解放区开民主选举会的情景，镌刻在彦涵题为《豆选》的版画中；在解放区外的民主运动中，则有例如西南联大一位同学（现在香港的诗人何达）写过：“面对着共同的命运，我们开着会，就变成一个巨人。”这首题为《我们开会》的朗诵诗，闻一多先生曾采入诗选，朱自清先生曾予以评论。

我们不怕人说“共产党的会多”。因为要实行民主，不开会是不行的，虽然开会并不就等于民主。我们千百万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群众，不是

从《民权初步》，而是从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学会了开会，掌握了当家做主的意识的。

无论大会小会，什么形式的会，只要遵照民主的原则，集中群众的智慧，沟通不同的意见，解决实际的问题，人们是关注的，支持的。我们经历过正反面经验反复对比而在政治上趋于成熟的人民群众绝不一般地反对开会。

至于违反人民利益和意志、违背民主原则的会议，最典型的如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间全国各地对于从上到下强行布置的所谓“批邓”的大小会议，言不及义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总之都是一种抵制。多少年来，人们对于只有上意下传而无下情上达，只有“一致通过”而无议论纷纷，只有“一言堂”而无“群言堂”的会而不议的会，大抵都是持这样的态度。这类会议即使不是借以整人，而是想要贯彻执行什么，由于不能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也就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增进团结，取得预期效果。

我们说“文山会海”是贬义的，我们要用移山填海的精神去解决的，自然不是一切会议和文件，这个“会海”我想是着重指违反民主原则的，以及各种毫无实际效益，徒然浪费国库的会议。

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可开可不开，甚

至开了不如不开的会，人民不喜欢，只有“华威先生”喜欢：争名于会上，争利于会下；说“官话”，讲废话，或扯皮，或扯淡；同时大吃二喝，自有公费补贴，而有关群众生活、实际工作则轻描淡写，走场而过。这样的“会海”，直截了当地说，只是使官僚主义如鱼得水、浮沉其间的“宦海”而已。

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哪一级组织会风不正，反映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哪一级组织党风不正。从严治党，也不可不注意于端正会风。使一切必要的会议成为健全民主生活、贯彻群众路线、解决实际问题的组织渠道，那末即使“偏激”的马雅可夫斯基复生，也不会再呼吁“把一切会议扫除干净”了。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载二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 探索：这是一个崇高的字眼\*

几天以前，为陕西的朋友们所编的《朗诵诗选》，我题赠了这样几句话：

前进 向上 发展  
开拓 探索 追求  
这是诗的品格

诗与理想不可分  
诗与创造不可分  
诗是年青人的事业

我愿把同样的话赠给《探索诗选》的读者和作者。

---

\*此文系作者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所编“探索丛书”中的《探索诗选》写的序言。

探索：这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一切科学和艺术的创造性成果都以探索为先导，但不是任何一次或任何一项探索都必然获得成功。与其把探索者的称号当作一顶桂冠，毋宁视为一顶荆冠。

脚踏实地的真正的探索者的道路，是在前人和别人止步的地方，望而却步或步履踟蹰的地方开始的。然而探索不是摸索，不是处于对自己和对客观世界的盲目性里，于一片黑暗中茫然起步。不是踏着既有的脚印亦步亦趋，却必须历数来路上的足迹：前人或别人是在什么地方走到自己途程的终点，在什么地方，又为了什么而或失足，或误入歧途，或走不下去了呢？

探索者为一种理想所鼓舞，为开拓的精神、创造的渴望所鼓舞，向确是前人和别人未曾企及甚至未尝窥见的地方走去。不是为了探索而探索；探索虽然能带来某些新奇感的满足，但探索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发现——对于诗的探索者来说，宏观上是发现前人未曾发现过的诗的某些艺术规律，发现更广阔的诗的思维空间，微观上是发现一种新的技法，一组新的意象……从而在理论上提供新的观念，在创作上开拓新的境界。

诗的探索，必然与社会思想、艺术思想的探索相伴随，必然与探索人生、探索社会的实践相

伴随，诗的探索，作为艺术实践，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它不能离开整个的社会实践，也不能离开诗以外的其它门类的艺术实践——无论是它们的成功或失败的方面，康庄大道或是曲折的弯路。

而最后，一切探索和新的发现，一切由此出发的创造的成果，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时间和读者的检验。

一部诗歌史，是各个世代在诗的领域（直到诗与别的文学体裁的边界，以至涉足于诗的“外星”）进行探索的历史，是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不断进行创新和开拓的历史。这种创新和开拓，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上，经常表现为儒家诗教的正统与道家、禅宗思想影响下的非正统以至反正统之间、文人诗与民间诗歌之间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互为反拨又互为补充的过程，其影响及于本体论、风格论、创作论各个方面，呈现极其错综复杂的、源流派系相互纠结的师承递嬗、批判扬弃关系。各家都从各自的侧面和不同的角度作出自己的历史贡献；而在每一螺旋形上升达到新的高度时，一般总有由深广的历史潮流推出的熔铸众家、承先启后的大家，在诗歌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成为更新的一代探索者的出发点。

我们当代的探索者，应该象马克思那样，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全人类的思想文化成果，然而绝不是历史和文化的虚无主义者。

在诗的探索方面，要求我们的探索者——这里着重指在创作上进行探索的诗人，自然也包括他们的理论代表——是清醒的，而不是盲目的：不仅有为缪斯驱使的激情，而且有基于坚实合理的知识结构的思辨能力；不仅能攀到时代的峰巅回顾来路、选择前途，并且尊重同样走在探索途中的同行者的选择；有博闻、博采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视野，而没有唯我为探索的褊狭、短视和骄气。这样，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经由探索而接近新的发现，既可以不致重蹈前人和别人已经碰过壁的死巷，也不致陷身于越走越窄的狭路，更不致半途而废。这样的探索者，今天不是多了，而是还少！

因此，我要向真正的无畏的探索者献上衷心的赞歌。

只热衷于探索者的桂冠者，终将会经受不起探索者的“荆冠”而退出探索的队列。真正的探索者则将不顾颠簸、不计成败、不计利钝地奋然前行。

希望长存的，先要执著于现在；希望走向世界的，先要走向与自己同一语言的人民；希望有

所创新的，先要不游离奔湍常新的历史潮流。

我很赞成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探索丛书》来支持文艺上新的探索。尽管这本《探索诗选》我仅仅看到初选的目录，所选的未必篇篇都够得上称为创新探索的典范，而且，显然近年来诗探索的成果也绝不限于入选的篇章。然而，即使只是表示对一切有志于探索的诗人的支持，为曾经被等同于反动的“探索”恢复名誉，就使这本书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价值。

借此篇幅向诗歌和一切方面的探索者致敬，不管他们的探索是否成功，即使失误甚或失败了，此为继续进行的探索贡献出严肃的经验。

一九八六年二月三日

（载五月三日《文艺报》）



# 说 禁 忌

报载某地的县人民政府作为当地一座大桥通车典礼纪念赠送的礼物，是一个套着塑料薄膜的现代日历牌，上面挂的却是“老皇历”，原来三百六十五天每一页上都标有吉、凶、宜、忌。

“黄道吉日”办喜事，当然好上加好。问题是不在少数的日子都有禁忌，甚至“诸事不宜”，怎么办？

虽然照此办理的人未必很多，但封建迷信今天还会在某些角落里复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惊讶、关注、感慨，重提“科学与民主”的话题。

回想旧社会老皇历普遍通用的时候，这些禁忌也并“不上大夫”，主要是在精神上钳制无知的顺民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能有不畏天命、不畏大人的胆识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先进的哲人，连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思想深处也不能脱离对天命与大人的畏惧，此所以有被招安，有成

功以后的变质，去承袭封建的道统。

那时中国的普通百姓，统治者眼中的“愚氓”，于服从人间的朝廷之外，本来并没有专一的宗教偶像，唯其不专一，结果流于“泛神”式的无往而非偶像，仿佛万事都体现着“冥冥之中”的天命，不但灶王爷在千家万户里司着监督查缉之责，而且“暗室私语，天闻若雷”，一言一动，一举手一投足，怕官家皂隶，还要怕老天爷，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禁忌。

山村的农民讳言狼，而呼为张三，据说是怕直呼其名，就会招之上门。冥冥之中的上帝的无孔不入的恶毒，在群众心目中或下意识中其实正与祸害人畜的狼一样，因此是要多行禁忌，避其锋芒，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民间禁忌之多，就是这个缘故。虽做顺民，亦良苦矣。

编老皇历的人自有其推算的根据，然而正是利用群众这种畏惧心理，才能得售。自然，群众自己还有引申和发展，比方农村老奶奶教孩子不要从晾衣服的竹竿下走过，那无非因为竹竿难免晾褻衣，尤其因为下体是不洁的，从那里穿行就无异于蒙胯下之辱等等，这就明显地带上了儒家礼教的人间色彩，但是隐隐之间又有天道在焉，否则谁来执行对触犯禁忌者的惩罚呢？

想想我们历代对人间与天上、此岸与彼岸的

统治者唯恭唯谨的先人们，也真是可怜得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战战兢兢地看大人和上天的脸色，这种“禁忌”之为精神的枷锁，是比有形的鞭笞更加严酷的，因为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深入人心；甚至当铁打的镣铐已经打碎以后，它的威慑犹存，束手束脚，束缚人的灵魂。

“怕”与禁忌，是恶性循环。只有破了“‘怕’字当头”，才能做到百无禁忌。“不宜动土”，二诸葛的禁忌早成了笑谈；八十年代的日历牌上，还能悬挂诸多禁忌的老皇历吗？

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

（载三月十五日《羊城晚报》）

# 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前几年，一位朋友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他要代文艺界起草一篇《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号文》。

文艺界从卸掉“牛鬼蛇神”、“精神贵族”的谥号，到被封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真是有殊荣焉，地位大大改变，责任也加重了。不过随着这顶桂冠俱来的，是远非文艺工作者（哪怕是百万文艺大军）独立所能承担的。例如青少年犯罪等由多方面因素造成、需要综合治理的社会问题，一朝也都找到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门上，光荣称号的分量于是可知；在不敢辞其咎的同时，不惜辞此虚荣，耿耿此心，该是人天共鉴的了。

撇开文艺界“不敢当”的这份苦衷不说，我以为单把文艺界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失于狭隘，只是习焉不察而已。

文艺工作者而外，大中小学的教师以至幼儿

教育工作者，既教书又教人，培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他们算不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作者，编辑、记者、评论员，或为耳目，或为喉舌，诉诸视觉听觉，力求深入人心，他们算不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做人的工作为己任，特别在当前，端正党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则一切对整党负有领导之责的干部尤其要先行一步，重在身教，无论从权、责哪方面说，他们不都也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

人类灵魂工程，可以说是一项规模浩大、层次纷繁的系统工程，文艺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整个工程要求有一支全社会性的宏大的设计施工队伍，在统一指挥下协同配合。

最近司法部长邹瑜评价有少年犯参加演出的新片《少年犯》，说其中凝结了文艺和司法两方面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劳动。他就不仅仅把文艺工作者视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而且把负责管教少年犯的司法工作者也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来要求，这是十分明达的，符合实际的；对文艺工作以外凡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界，无不以类推。

然则这么一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太多了吗？我说，多有什么不好？不是有过人人做思

想工作、人人动手建设精神文明一类口号吗？怕只怕落实不了，办不到，更怕设计时脱离实际，画错蓝图，施工时粗心走样，偷工减料，甚至有人拿当年“触及灵魂”式的老一套来冒充“灵魂工程”的新方案。

人类灵魂工程，不管它从这个角度叫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从那个角度叫作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总之，它既属百年大计又属燃眉之急，是与四化建设进程相伴随而又相辅相成的“人的现代化”。

这样看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绝不限于文艺工作者，光荣共享，责任同担。而一切从事于人类灵魂的工作者（容或有专业业余之别，高级初级之分），要想无愧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无例外地先要检点自己的灵魂，因为这都影响到工程质量，正如一切精神产品都展示生产者的精神面貌一样，掩盖不得也推诿不了。

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

（载三月八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听歌记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重听一支歌，过来人常常会情不自禁想起往事，仿佛回到当年；后来者也会因听《五月的鲜花》而重温三十年代的沉痛和激愤，因听《太行山上》而向往抗日烽火中纵情歌唱的自由之神。

就以建国前后的歌曲来说，一曲《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唤回那如日方升的岁月的记忆；流行一时的苏联歌曲《卡秋莎》和《共青团之歌》的“听那战斗的号角发出警号……”，使我们好象又置身抗美援朝的队伍中间。接着，在反右斗争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引起的自然是那歌声中城乡“大辩论”、“大跃进”的种种记忆，对于曾经身历者，无论是依恋或厌恶，全都记忆犹新。这无需借助于什么“音乐的耳朵”，因为大家唱的听的都是政治，而不是音乐。

烈火烹油的十年“文革”，京剧“样板戏”凌驾于一切音乐、戏剧、文学之上，占领舞台，也占领过男女老少的耳朵。此调不弹久矣，忽然大约从一九八五年起，似乎又有行时之势，荧屏上偶一露头，舞台上频频出现，这也是为了唤起我们对“文革”的回忆，怕我们患了健忘症么？然而在不同的人那里的反响，岂不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吗？

江青之流对文艺节目插手介入的程度不同，各个节目体现所谓“三突出”原则的程度也不同，江青曾经把文艺工作者们编演的节目攫为阴谋政治的资本，这些节目毕竟不等于江青的言论或“批件”。然而问题不在于对“样板戏”逐个地或逐段地具体分析，而在于时至今日还有人对它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是为了什么？

几年前拜读过邓友梅、刘绍棠在《北京晚报》发表的文章，谈到他们听到广播“样板戏”的条件反射，我想几年后的今天他们也不会就变成“样板戏”的倾心者。他们的感情在文艺工作者中，在“文革期间”被专政时被迫听“样板戏”的人们当中是有代表性的。

几个月以前同一位作家谈起他曾执笔而后来被江青之流篡改的一个“样板戏”剧目，他的表情竟有如吃苍蝇之感。我想他的感情在曾经厕身于



“样板戏”组的文艺工作者中也是有代表性的，他们不会忽发翻检箱底的豪兴。

也许年青人感兴趣：君不见他们鼓掌助兴乎？不过他们并不能左右节目的安排，也因为他们还年轻。就如据说个别幼儿园的小朋友居然在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好不热闹，自然幸亏只是个别幼儿园；好奇凑趣的孩子们现在不懂得唱词和口号的深意，有朝一日记起童年的歌，又当作何感想？

歌听弦外音。在全国正在着重抓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样板戏”重又探头探脑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莫不是对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政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对“文革”则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一股潜在思潮的浮标么？

我们用什么来“纪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愿各方贤达有以教我。

一九八六年二月九日

# 尚未失传

鲁迅生前，在笔尖的围剿中，曾经想编一本《围剿集》，于那些“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之外，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使读者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他认为，“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

果然没有失传。半个多世纪了，中国的历史几经曲折，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想不到当年上海小报上那类文字，竟又出现在今天。什么“见到这么多清一色的鲁货，我担心自己是否也被鲁化了”云云，连口吻都似曾相识；而又发表在专登“杂文”的报上，这证明杂文不仅跟鲁迅的名字联在一起，竟也会跟围剿鲁迅的遗风联在一起；杂文的确不止有一种被称为鲁迅笔法的笔法，利用杂文形式对鲁迅和他的作品奚落漫骂，也自有其战法的师承。这样的文字真是可以收入

《围剿集》续编的。

还在“五四”以前，鲁迅就批评过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图画增刊《泼克》上的讽刺画以恶劣的形象作人身的攻击，指出那思想的顽固，人格的卑劣，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而子”一样。针对《泼克》美术家骂别的美术家“盲目盲心”，不懂得他们的“新艺术真艺术”，鲁迅恳切地说，“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我想这话完全可以移赠与把鲁迅杂文以至全部“创作生涯”贬得一文不值的今之“泼克”们；不知他们听了以后，反击的武器和战法可有什么翻新。

这一套的确没有失传，一因为还有思想基础，二因为还有用武之地。十年动乱记忆犹新，“文痞”当道，棍子横飞，小报畅销，大字报满墙，单是把刘少奇的“奇”字歪曲为“狗”，这个创造，比起画个王八贴到别人背上的儿戏来又有什么两样？当然，一切分明不是儿戏。奚落别人，已足表示自己高明；抹黑别人，更可以表示自己干净；骂别人如何不行，自然表示自己怎样的行。这是鲁迅领教过也揭露过的围剿者及其帮凶和帮忙、帮闲们的伎俩，至于是书面上白纸黑字还是口头上贼喊捉贼，指名道姓敲山镇虎还是姑隐其名旁敲侧击，那就因时因势，各有巧妙不同了。

温故可以知新，对施之于鲁迅或扩大到鲁迅以外的各式棍棒，也不难从文风找到它的谱系。

鲁迅有言：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然而，读了八十年代贬损鲁迅的文字，我们却能看清一类卑下的文品，而且是渊源有自，混迹于文坛，一时又不易澄清的。它们的认识价值就在这里。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六日

（载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 论优越感

常得老师表扬的小学生，由于功课比较好，或者再加上能听老师的话，往往成了“依靠对象”，当上小干部，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会滋长一种优越感——也就是“出人头地”的自我感觉，对理应平等相待的同学显得不那么平等了。我就听一个小学生口口声声说他们班上的“差生”长“差生”短，很有点居高临下的样子。

尽管这也曲折地反映着某些社会相，但社会上年深月久残留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可就复杂得多，远远不是建立在主要是成绩单的基础上了。

从古以来有各式各样的优越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形诸颜色、见诸言行的表现：

金钱能给人以优越感，“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权力能给人以优越感，“官大一级压死人”，

“官升脾气长”嘛。

钱与权以外，又有门第的优越感。

所有这些，足以骄人，然而金钱、权力、门第本来不是百年千秋一成不变的，要想巩固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一些人就会在优越感所转化的自发力量的鬼使神差之下，去夺取更多的金钱、更大的权力，以图更加光大显赫的门楣，扩大为所欲为的空间，为此而象马克思所揭示的：“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甘冒绞首的危险。”

不过，这种以金钱、权力、门第为后盾的优越感，臀部烙印着剥削阶级和宗法社会的戳记，它在封建的以至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是合法的，跟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则不相容。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要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通过民主的发扬和法制的完备，去缩小直到消除旧时代残留的金钱、权力、门第等优越感对社会风气 and 政治生活的影响。

我们当前正致力于改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显示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斗争。我们因我们的理想、信念和我们事业的前景而感到自豪。

自豪感，而不是什么优越感，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之一。所谓优越感，总是同某种盲目性相联系，所以我们是把它当作贬义词使用的。

各民族各有自己的短长，应该平等相处，民族间不应该有优越感。从封建统治集团到资本主义煽动民族优越感，至希特勒而穷凶极恶，给人类制造了巨大的灾难。但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也是不自由的，历史的教训昭然。

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还宣扬神话般的阶级（包括贵族种姓）优越感，在旧社会这也成为统治的思想。时代不同了，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然则无产阶级应该有优越于其他阶级之感吗？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获得自己的最后解放。从阶级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别成员的狭隘观念出发，它不会背上什么优越感的包袱使自己陷于盲目，并脱离自己的同盟军的。因此那种所谓“红五类”的区分以至“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等等，归根结蒂还是由封建阀阅制度一脉相承地重门第、讲出身、托祖宗余荫、靠裙带关系的老货色及其变种，同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政治毫不相干。

群体如此，个体亦然。无论什么人，因有所凭借而自视过高，多一点优越感，就少一点自知之明，而陷入对自己的迷信，也就是对金钱、权力、门第之类的迷信。然而在迷信金钱、权力、门第的前提下迷信自己，是跟迷信别人或任何偶

像一样虚妄甚至荒诞的。

既有雄才又富野心的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而自命“我比阿尔卑斯山更高”，他所迷信的是自己已有的权力和企图谋取的更大权力，他的优越感可谓登峰造极了，但这也就是他走向失败的开始。

回到开头的题目，为了新一代的健康成长，避免将来从中出现因野心和妄为而最后跌到肮脏去处的人物，还是从小就不要助长包括“优越感”在内的低级趣味吧，这是从消极方面立论；从积极方面说，就要从小培养坚持理想、坚持道德的高尚情操和意志力量，从而使他们能够鄙视并抵制金钱、权力和门第拜物教的香烟中所氤氲的种种迷信和低级趣味。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

（载二月二十一日《中国青年报》）



# 故事和真事

已故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不少讽刺诗，读后感到先得我心，其实是他所讽刺的人和事正为我们所习见。随手翻到一首《说的是故事，几乎是真事》，飞白译文同原诗一样取楼梯式，现连行抄如下：

主任挠着头，怒火直冒：  
“手表配一支秒针竟要八毛！”  
公司一怒之下，派人采购秒针，  
派出洋的是浩浩荡荡一支大军。  
从波兰到智利，东奔西跑真吃力，  
磨尖舌头，报告写了一大批。  
（可就是偏偏不到瑞士去，  
因为我们不懂“瑞士语”）<sup>①</sup>

---

① “瑞士语”是不存在的，瑞士人说的是德、法、意语。

乘着汽车东转转，西跑跑，  
买了领带又买礼帽。  
许多人自己不仅仅  
解决了秒针，还解决了手表。  
钞票为此遇到了龙卷风，  
呼啦啦送进了烟囱。  
出国归来，先往家里送皮箱，  
再夹起皮包去汇报情况。  
至于那小小的秒针儿，  
从此后涨到了一块二。

这首诗写于一九二八年，应该说是从“真事”提炼出的故事；我们读来亲切，因为这类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弊病在我们这里还是远未杜绝的“真事”，只是近来很少进入讽刺文学作品，或者说，我们近年来很少有有力的“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讽刺作品，可供今之“采诗官”采来以察时弊、观民情了，如果还有“采诗官”的话。

文学作品不是推背图；即使再具“超前性”，也不过是靠作者的慧眼在已有的社会生活中体察细微，于好事是发现萌芽，扶持其成长；于坏事是在风起青萍之末时，作防微杜渐的呼吁，当然，文学也止于呼吁而已，代替不了实际的解决。

看报载上海处决的强奸流氓集团陈胡葛三个主犯，都是从一九八〇年前后开始作案的。假如当时当地的讽刺文学作品所提供的信息例如冒充高干子弟进行违法活动的“故事”，在引起注意后能切实从中汲取教训，多方面采取防范措施；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只是一些家长能在国法党纪的惕励之下加强家教，也许他们的子弟就不致堕落到后来这样无可挽救的地步。

说这些话，对于有关的家长，似乎已成为“事后诸葛亮”了。然而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对于一切关心国家人民命运的人来说，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从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艰难曲折，从今天中央端正党风的决心和行动，以及这些决心和行动在人民群众中获得的热烈反应，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包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以他们的笔参与社会生活的问题，则“事后诸葛亮”是可望转化为今后的“事前诸葛亮”的。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载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就重在朝朝暮暮

阳春三月，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照例报纸配合宣传，机关组织植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写成标语，喊作口号，要热闹一下；而除了专业的林场以外，一般的植树往往只顾栽树，不管成活。此节一过，林业就排不上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而违犯《森林法》乱砍滥伐，更是依然故我，只剩下各级林业部门到处呼吁，陷入扯皮之中而已。

秦少游写牛郎织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说的天上的事情。至于人间，有些民俗一年一度也就可以，元宵、月饼和粽子本来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植树节自然也不必一年两次；但是绿化工作特别是贯彻执行《森林法》的工作，每年若只是趁植树节的“东风”抓那么一次，怕就远远不够了。

早在《森林法（草案）》一九七九年公布的时候，我写过一首欢呼的诗，其中有云：“我愿人间的执法者／永不向违法者屈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才不是一纸空文”，那是因为听到各处滥伐林木，“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使我国原就不高的森林覆盖率实际在迅速降低，寄厚望于《森林法（草案）》的试行。

《森林法》从一九八五年元旦起正式公布施行了。然而，一年多来虽也听到一些林业先进地区如豫东和河北塞罕坝绿化的好消息，却仍然更多地听到这里那里置《森林法》于不顾的坏消息。在一些基层谈不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竟是干部带头，一哄而起，目中无法，以身试法，试的结果是“法不责众”，利益均沾，权大于法，不了了之。乃知在文盲众多，并且在文盲和非文盲中有更众多的“法盲”的国度，在法制本来就不健全又受到以权干法的干扰的地方，把纸面上的《森林法》化为对老林幼树、国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切实保障，是何等艰难的事！

然而破坏电路、盗卖电线的案犯不是已被逮捕，追究刑事责任了么？为什么对抗《森林法》、破坏《森林法》执行的罪犯有许多逍遥法外，却不能绳之以法呢？除了木材或贿赂堵住某些人的

嘴、捆住某些人的手以外，也还因为对于《森林法》作为法的权威性认识不足，对于滥伐林木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不象电线被盗、电路切断，影响就在眼前呀！可见不仅对一般群众，就是对干部，特别是工作涉及林业，有责任维护《森林法》的干部，普及《森林法》的宣传，普及森林与人类关系的常识的教育，做得委实不够！每年只在三月间植树节前后抓一下，雨过地皮湿，甚至地皮都不湿！

中央从去年起就决定不再以三月份为文明礼貌月了，因为文明礼貌活动要贯穿全年。还有什么爱民月、优质服务月等形式也都有流于形式主义之弊：此月一过，还爱民不爱，还提高不提高服务质量呢？不过，我没有取消植树节的意思，就如我也没有取消教师节的意思。绿化祖国和尊重教师，一关系十年树木，一关系百年树人，都影响于千秋后世，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我说，决不能只是一年一度抓一抓，要重在朝朝暮暮！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载三月十一日《光明日报》）

# 改革万岁！

一九八六年春天诞生的孩子，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将恰恰满十四岁，正好是入团的年龄。

他们才真正代表未来。

改革，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他们——未来的主人。

未来万岁！

改革万岁！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的名言，至今镌刻在他的墓碑上。

全人类都是在不断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改变世界的历史。

谁与改变世界的潮流背道而驰，谁与现代化和为现代化实行的改革相抵触，谁就只是加引号

的马克思主义者。

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装饰品打扮自己的人，头顶共产党员的称号滥权营私的人，我们见得多了；因此对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发改革财”的人跟以改革未能十全十美而振振有词挑剔指责的人之沆瀣一气、上下其手，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在中国要推进改革，需要：韧。

既不可陶醉于廉价的乐观，也不必沉湎于廉价的悲观。

广大城乡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已经或先或后、或多或少地从改革中获得了经济的和政治的权益。他们不是为了“表态”，而是由衷地说：我们拥护改革！

他们也有不满：一部分是来自过于操切的紧迫感，而只要让他们如实了解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和问题，这种不满就会涣然冰释；还有一部分，则有待于我们**改变**现状，并迫使我们坚持而不是放弃改革，因为他们是不满于若干党组织抓党风抓改革的行动不力甚至决心不大，不满于锐意改革者受挫和阻挠改革者当道——在一时一地常常



弄得是非不分、正邪不辨、赏罚不明！

在澎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的大潮下面，隐隐地潜伏着一股思潮的暗涌，就是对两个三中全会所开创的改革的方向和实绩持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而对十年“文革”却竟至抽象否定而具体肯定！

这股思潮的暗涌在向我们挑战。

但我们绝不能回到“文革”。

也不能回到五十年代。

中国，要前进，迈向二十一世纪，以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一代与历史同步的新人，跻于全世界民族之林。

这条路自然不会象长安街一样笔直平坦的。

有顺境，也有崎岖曲折；有明处的路障，也有暗礁险滩。因此必定有欢乐也有忧愁。

为公仆者，要为主人分忧，进而以有成效的工作为主人解忧。这才是常说的与人民共忧乐的真正含义。

一切自命为人民公仆的干部，一切自命为马

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人，过去借助于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声望和威信来做工作，今天则只能以自己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献身改革的行动，来恢复、维护并提高党和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一度被蛀虫、骗子们败坏了的声望和威信。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区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绝不追逐个人、家庭或小集团的特权、私利以及所谓实惠；他们同人民群众一道，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失去的将只是贫穷、落后与过时的条条框框拼凑的旧梦，而得到的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和属于今天的青年、少年、儿童以至婴儿们的，并非可望不可即的未来！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载《新观察》一九八六年第七期）

## 也谈“隐私权”

《新观察》第三期上盛祖宏同志关于“隐私权”的文章，有理有据地指出从不尊重“隐私权”到发人隐私，这种社会病给人造成的心理干扰；在这以前，刘心武同志在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和《黑墙》等作品中，也都曾涉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感情上的秘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把这作为一项公民权利来提高呼吁。

然而，象《小二黑结婚》里热心“捉奸”的金旺兄弟，至今即便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们当中也并没有绝迹；象《上海屋檐下》里习于从锁眼窥察邻人的小市民，也许已经有了“关心爱护”甚至“维持治安”的堂而皇之的名义。六十年代初敝街道委员会的主任，一位“新生妇女”张氏（当时街道中人在背后都叫她“张小脚”，带有人身攻击性质，是不足取的），有一天到我家来巡视，见通向内室的门放着布帘，就要不请自入；

家母拦阻了一下，更坚定了她必欲闯入的决心，——终于闯入了，但见我年过古稀的老父亲在用药水洗痔疮！

窥人隐私是一种缺少正常健康文化生活条件下的低级趣味，其档次与爱读宫帏秘事与私情丑闻的书刊等；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不难发展到飞短流长，直至捕风捉影，添油加醋，造谣传谣，诽谤中伤。在政治运动中为了“搞臭”政敌，这种手法自然又不失为可用的投枪或暗箭了。

既然如此，岂不真的应该大声疾呼“尊重隐私权”，以杜绝上述不利于安定团结的种种流弊么？

我却以为为时尚早。如果离开全民文化教养的提高和社会政治风气的全面改善，孤立地提出这种道德要求，只是一句空话。倘要求将“保护个人隐私权”订在法律上，则比起保护公民人身的、言论的、通讯的以至政治上的种种基本自由权利来，这还是小焉者，这些基本权利中也部分地包括了“隐私权”，比如通讯自由受到侵犯，不就往往是由于有人私拆信件窥人隐私吗？时闻某些基层法制不健全的地方，违法乱纪的干部还在欺压群众，人身之不保，“隐私”云乎哉！社会主义法制要一步步健全起来，而也只有成龙配套，才能形成对公民权利（包括个人隐私权）的整体上的保

障；反坐法尚付阙如，诬陷诽谤者不受惩罚甚至在某种条件下受到纵容，则什么个人“隐私权”，“感情的秘密”，颇有些近似于白日说梦，雨夜谈鬼的奢侈了。

不过，若说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来没有过“隐私权”，也不是事实。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历久常新的教条，不就是“尊者、贤者、亲者”享有“隐私权”的明证么？只是这“隐私权”同样地“不下于庶人”而已。至于这种不是一般而是形成特权的“隐私权”的伞下，所包容掩盖的，恐怕就已不限于“帷薄不修”，还会有各种见不得人的东西，什么一手遮天、贼喊捉贼的阴谋活动等等。江青不就是这样一个人么？

在整体说来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不完备的情况下，单独强调“隐私权”，我怕会有被别有用心与法术的人利用来作为庇护违法乱纪行为的虎皮的。这自然绝不是盛祖宏同志提出“尊重隐私权”的初衷。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载《新观察》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 《雾失楼台》：一首电视诗

我们已经有了诗化的散文、诗化的小说，现在又看到诗进入了电视剧。广东电视台根据黄秋耘同名散文改编的电视剧《雾失楼台》，于重视以情节取胜的电视剧之外，又做了新的尝试。

《雾失楼台》不是全无情节：一个被划成“右派”的音乐教师，跟他未成年的女儿，以琴声觅得了知音，随后“文革”风暴袭来，父亲死去，孤女不知流落何方。知音者异日归来，“人去楼空”，怀想故人，不胜惆怅。仿佛平平淡淡地叙述出来的两个人的命运，其实代表着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在他们的命运背后，更淤积着、涂抹着、渲染着“文革”中千百万人的血泪！借用秦观“雾失楼台”那首《踏莎行》词中的另一句：“砌成此恨无重数！”

人们在文字上回顾“文革”以至过去“左”倾错误造成的不幸后果时，常常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云云。从那时代过来的人，众所周知，

自然不待多说。但仅就《雾失楼台》所回忆的人事来说，距今也已经二十多年，当时种种，今天的年轻人就未必周知，尤其未必深知了。倘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末，不知历史，又怎么能从历史上的是非得失汲取经验呢？

《雾失楼台》中的“我”，从始至终以真诚的独白，倾诉了对那不幸的父女俩的思念，倾诉了人间曾有过的深沉和真挚的情谊的追怀。这和片中穿插的音乐一道，随着父女俩命运的起伏，形成特殊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打动我们的心。这不是简单叫作“文学性”和“音乐性”所能说明的。这是通过“我”的抒情性叙述，也借助于片中音乐（古典的和创作的），播撒于全片的文化气氛和人道精神，它使父女俩的命运超越自身，赋有了更深厚的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对“文革”这场灾难的反文化、反人道实质的控诉力量。

黄秋耘同志的原作为本片提供了很好的文学基础。还该感谢导演、表演和音乐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例如一个小小“配角”的添加，那只可怜的小狗，不但烘托出主人的寂寞和善良，而且点出畜类如此犬，倒比某些人较通人性，这是意在言外的妙笔，令人叹息，也发人深思。

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

（载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 说“低沉”

几年前在评论多人诗合集《白色花》里的诗作时，我曾经说过：“悲愤的歌也许不是高音，却可以是强音；不论就音乐的规律或借喻的意义说，强音不必都是高音。”

那时候有人用“低沉”两字来贬低与他们欣赏推崇的以“高昂”制胜的风格以外的各样风格，尤其是否定一些沉郁顿挫、寄慨遥深的作品。所以我说了这番话。

最近在关于广东电视台根据黄秋耘同名散文拍摄的电视剧《雾失楼台》的议论中，在多数肯定了此片的思想意义、现实意义以外，也听到不屑的判词，又是那两个字：“低沉”。

是的，如果“低沉”是同神采飞扬的“高昂”相对的话，这部电视剧怎么能不“低沉”呢？

这是一对因政治迫害和株连歧视而遭到社会鄙弃的父女，他们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然而从



流放地回来，五年中门前冷落，不但没有知音，而且无人存问。他们怎么能有样板戏主人公“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那样辉煌的色调，又怎么能有捉鳖揽月一类意态轩然的豪言壮语呢？

这是片中第一人称的作家和这对父女间一段相濡以沫的友谊，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特定处境中，借前人的琴曲，通彼此的心音。但动乱骤起，人琴俱亡，幸存者闻笛思旧，“感音而叹”（这是晋向秀《思旧赋》里的话），自然不免低回沉重。若是强令画外音也“抒豪情，寄壮志”，出语铿锵，红火固然红火了，可正常人物形象和正常的人的感情的逻辑安在？正常的观众又将被置于何地呢？

一个悲剧时代刚刚过去，痛定思痛，当然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不过从悲痛到力量之间，该有一个对历史的反思和清醒的再认识作为中介。舍去悲痛再离开反思，则所谓力量，不就成了虚声鼓虚劲吗？

试看片中表现的时期，从“文革”前夕的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到一九六六年的雨骤风狂，木摧草折，千百万身受其害的干部群众一时完全陷于被动，不仅丧失了发言权，甚至丧失了人身自由，还有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倘毫不矫饰，如实地再现那一派乱世风色的典型环境，那么当时

昂昂扬扬、高出于尘上者，无非是红卫兵“集中火力打黑帮”歌声，造反派“文攻武卫”和“砸烂狗头”的口号，以及“样板戏”的丝竹管弦罢了。

反映那个历史时期，而又避忌“低沉”无异于取消对这一题材的真实处理。而且严格地说，

“低沉”云云，并不是涵义确定的科学术语，把它等同于消沉，从而一口抹煞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倒是省力；如果真的用它对文艺作品进行美学判断，就嫌弹性太大了。

涉及“文革”或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文艺作品，未必都是“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的分类概念所能包容；而划分十年来新时期文学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恐怕也不尽贴切——这种简单的时限分割，容易导致把反映“文革”及以前某些历史生活同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反映对立起来，或者索性认为“‘伤痕’、‘反思’俱往矣”了；其实关于“文革”以及在这以前左倾错误背景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我们还缺少真正具有史诗规模和意义的力作！

电视剧《雾失楼台》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抒情特色，通过情绪和氛围的点染，寓悲愤的控诉于对患难之交的追怀中，留给观众一片无可弥补

的怅惘之情。

“低沉”么？它低沉而有力。力量就在于：它以这一片怅惘之情，唤起健忘者的记忆，唤起麻木者的思考，唤起一切共鸣者向往、追求、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新生活的冲动。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

《载四月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 世无完人论

什么是完人？想来该是完美无缺、通体圆满的人吧。

那么，如果有一种无可指摘的“完事”，也只能寄希望于这样的完人去完成。然而，没到“盖棺论定”，又怎么能知道毕其一生是彻头彻尾毫无缺点的完人呢？一到盖棺，倒真是“唯有未生和已死的人不犯错误”了，可惜那毫无缺点的“完事”也将随之成为殉葬的空想。

小时候相信过世上有完人，比如古圣先贤就是。稍大一点读了些近于离经叛道的言论，象明末张岱说的：“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想想孔庙里那些偶像和牌位，冰冷僵硬，确实赶不上生活中交往的有“疵”的活生生的朋友，不过当时也还没怀疑完人的存在。直到历经沧桑，知道了现代史上有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当代生活中有所谓“高大全”与“响当当”，都是

所谓完人了，而且自封以后，自吹自擂震天价响，可是看了他们的所做所为，这才真的懂得了自称盗贼者无须防，自称正人君子者则须防，自称正人君子而指别人为盗贼者，以及自命完人而对别人苛刻地求全责备者更须防：防其“彻底”尽头的“透底”，防其在市场上叫喊得最响而其实卖的是假货也。

只是到了这时候，也才懂得了张岱的后半句话——为什么“人无疵”便“无真气”：原来所谓“无疵者”身上不是真的“无疵”，只是力求遮盖以掩人耳目，但不管掩盖住掩盖不住，反正“真气”是被“假气”冲掉了。

所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疵”的完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日月有蚀，“圣人”也有过失的。

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是无可挑剔的“完事”，玉有瑕，珠有纇，“此事古难全”。

我们在英雄碑前衷心缅怀的先烈，也不是天降的完人，纸扎的标本，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共同抱着为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的理想，同时各各带着自己的出身、教养、经历所形成的全部优点和缺点，走过或长或短的革命历程，有所贡献彪炳于史册，也难免有过失可以惕励后人。我们的革命是无数忠贞的、优秀的但又无疑有缺

点的人们一道推向胜利的。革命者不等于完人，自然，革命也不是全无遗憾的事业。这无碍于革命的伟大。

今天的改革是又一场特殊形式的伟大的革命。难道能够要求在第一线上锐意改革者都是完人，而改革也必得是从一开始就万无一失的“完事”吗？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要打破多年的固定模式和固定观念，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更没有现成的新模式可以照搬。在可谓破天荒的亿万群众探索和创新的事业中，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在不断总结经验中继续前进。倘因发生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或者由于触犯了个人的某些利益和习惯，甚至只是看不顺眼，就怀疑改革的必要性，否定改革的方向和成效，对改革实践中的干部和群众横加指责，那就如看到学步的孩子步履稚拙而肆意嘲笑，认为还是捆到床上去、不要再走路，才算正经稳妥的好主意了。

但我以为，奔走于改革的新路，即使有跌蹶，投身于改革的潮流，即使喝两口水，也比躺在路上当绊脚石、站在干岸上单等捕捉弄潮者的缺点要好得多——积极得多，高尚得多，也正确

得多。若要求从事改革者都是十全十美的完人，要求改革的进程须是尽善尽美的楷模，结果也就取消了改革，不管说得多么漂亮动听。

于已成之局委曲求全，于新兴之事则求全责备，这是保守落后的历史惰性，鲁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经加以鞭挞。这种不健康的心理近年来的表现形态之一，就是向改革和在改革实践中的人泼冷水，泼脏水，必欲“改革”二字从亮晶晶变得灰溜溜而后快。

但是，实践是公正的。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要接受它的检验，证明自己虽非完人，改革也绝非天然地绝对地好，一切都好，但通过一步一步艰辛前进的改革，必定会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也完善我们自己。至于那些向改革泼冷水、泼脏水的种种借口，无论是陈义过高的空论，还是幸灾乐祸的苛责，也必然会在实践的检验下，显出到底是怎样的货色，怎样的用心，而一次又一次地从另一方面证明：世上无完人。

一九八六年三月九日

（载四月六日《光明日报》）

# 公款私用论

读北京《文摘报》(三月十六日)一则题为《商品房经营中的歪风》的报道，摘抄如下：

一九八五，黑龙江省搬进商品房的总户数为八千一百七十九户。其中居民个人买房的仅五百八十二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点一。这五百八十二户，个人全价购买商品房的几乎没有，有的单位竟花费七八万元为一些干部个人买一套住宅，本人分文不付。这些干部在本单位分房还有群众监督，住房也受到限制，出现商品房后，他们就毫无顾忌地为自己高价买房。

日前，在哈尔滨市购买一套一室的商品房需要二三万元，一般居民根本买不起。据调查，房价高同商品房经营中存在不正之风有很大关系。如有的实行商品房搭全套家具出售，以吸引一些单位的干部用巨额公款为自己买房。……

很希望有人能就此写一点比较详明具体的报



告（不一定是报告文学），既是解决住宅问题的  
工作研究，又可以作为解剖社会弊病的一只“麻雀”。

不过即使还没有这样的报告，我们一闭眼睛，  
也历历如在目前。不是报载有些县以下的大小小  
干部早已或用公款、或用公物，或者变相地动  
用公款公物，甚至盗用“公”字名义，调动廉价  
劳动力，为自己盖起单门独院的小公馆了么？上  
了报的自然鹤立鸡群，形迹太露；至于同样占  
用国帑，不拨一毛，营造“安乐窝”，但是不露形  
迹，未见报章披露的，谁知究竟有多少。

我们从战争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  
制来：那时候“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  
公家的粮”，入伍吃上公粮，才算你参加革命。进  
城以后，“机关办社会”，还是要把干部的生活包  
起来。后来衣食自理了，紧俏的住行依然是构成  
生活待遇的重要内容。所住何屋，所乘何车，这  
是工资以外的待遇。在现行工资制度下，即使工  
资相对较高的干部，如果硬是认真算细帐自付  
住、行资费，怕也会捉襟见肘。这么一来，“依靠  
组织”来解决住宅——以至于其他，就成为长期  
以来毋庸置疑的，仿佛具有天然合理性的观念。

因此，在本单位建房、本单位分房的时候，  
依照供给制时期传下来的负责干部吃小灶的惯

例，“依靠组织”嘛。改革住宅建设经营办法，试建商品房，也还是要“依靠组织”——用巨额公款为自己买房，似乎同属“理所当然”了。

在这里，“依靠组织”者何？就是依靠公款以供私用。这又岂限于买房！而这一切所以都通行无阻，则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依靠”亦即滥用了党和行政的权力，倘无权力，谁批条子，公款何从动用？

试行商品房建设和经营，是改革住宅经营体制的一项尝试。假如由于产生上述弊端（有的叫不正之风吧，有的怕不仅是“风”的问题），就象有些地方和部门一样，把“不正之风”捆到改革上，从而一顿鞭打。其结果，可能首先把改革之举打掉，但哪怕是从此不再搞商品房了吧，那些公款私用买下商品房的人们，也会“风雨不动安如山”，不必自掏腰包或顶多象征性地支付一二，然后合“情”合“理”合“法”地住下去的。这是积多少年之经验的痛心的预测，虽然深愿言之不准，多半还会不幸而言中的。

短短一则消息，象是房子问题，又不是房子问题。它所涉及、所牵动的远不止是住宅以至机关管理的弊端和改革。

生活呼唤着我们，在全面改革中使民主制度化 and 法律化，建立和健全保障发扬民主的群众监

督体制，制订有关各级公职人员（特别是负责干部）职责、权力和行为准则的法规，并且付之于实施！

然而，怎样才能使这一切不沦为空想和空谈呢？！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七日

《载五月四日《经济日报·星期刊》》

# 未能免俗

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心目中，神仙是极高的妙境：神乎其神，飘飘欲仙嘛；最要紧的是神仙可以长生不老，获得某种特异功能，飞天缩地，遁形隐身，心有所思，莫不如意，真是快活得很。

当神仙也有缺点，据说是远离红尘，住到虚无缥缈的九天之上，冷冷清清的海上三岛，要么就是荒山野洞，云深不知处，吃野果，饮清泉，象白毛仙姑似的。如果原是闹市中的乞丐，倒未必会生恋旧之情，而一直在名利场中的人，怕终于难耐神仙生涯的寂寞。

所以，《红楼梦》中的跛足道人，就要唱出“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只有娇妻忘不了……只有儿孙忘不了……”的“四不忘”的《好了歌》。

请问：出尘脱俗、太清玄妙的高超境界，跟

权高禄重、妻荣子贵的世俗追求，真的就不能两全其美吗？否。

神仙想做，功名、金银却难忘么？好办。做了神仙，照样封官晋爵就是。于是道州刺史杨城，又当了天下福祿神；举国闻名的财神爷赵公明，先是奉玉帝旨召为神霄副元帅，进而升为总管上清正一玄坛飞虎金轮执法赵元帅。可见神仙界中也大有可为，不但官自升迁，而且财能聚敛，远非仁瓜俩枣、十金百金的小家子气，袖里乾坤，竟容得三江四海的财源呀！

神仙想做，娇妻、儿孙却难忘么？也好办。方士献丹，胡医送药，一起做神仙就是了。君不见淮南王刘安乎：一人得道，白日飞升，连家中鸡犬舐啄了盛药的器皿，也都冉冉上天了。至于什么“但羡鸳鸯不羡仙”，只合是清贫寒酸的读书人的想头，才把鸳鸯与神仙两种生活方式对立起来，不知道大千世界中，鸳鸯并非呆鸟，神仙也未能免俗。

未能免俗：我们的老祖宗深知就里，因而捏合仙凡，创造了富贵神仙的理想形象、理想境界。早自秦皇汉武开头，做了皇帝想成仙，后来者们跟着来，服丹至死不后悔，自然不是想当“白首卧松云”、“寒尽不知年”的清苦傻神仙，而是要争取福祿寿三全，至富至贵以至于无涯的。

— — — —

神是人所造，中国的神，是掺合着中国世俗的生活理想塑造的。此所以中国历来的许多神仙，都带着富贵气，也就是官气、财气。而有意无意间被这样的神话给熏陶出来的，绝不会有真诚的迷信，更不可能有执著的信仰：浑浑噩噩者是未能免俗，精明干练者是未能免俗，甚至清醒明智者也要以未能免俗来嘲人并且自嘲了。

热心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根的朋友们，在探索原始蛮荒之余，也不妨考察一下三教九流大有特色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历史和心理积淀。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载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 似曾相识话顾荣

有人看了电视剧《新星》，说顾荣是个官僚主义者。我没有立即表示赞同。记得当年相信官僚主义者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象以外，其他方面都很象一具泥塑木雕：“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跟这个典型形象相比，顾荣似乎并不尽然。就拿头两条说吧，他哪是一声不响：他有沉默不语、含威不露的时候，而他更能在大会上板有眼、抑扬顿挫地作一些既原则又抽象的指示；对他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具体指示什么，而是他在这里作指示——行使权力是最有力的显示权力，显示权力常常又是最有力的巩固权力。他的谆谆教诲能让李向南闻到一种很熟悉但很难忍受的气息，以至感到压力、约束感和有针对性的警告。他不会象冯耀祖那样露骨失态地说：“有机会才下

手”，并且会当场指责：“这是共产党的语言吗？”这个顾荣又岂是二目无光？单是林虹就碰上他阴沉的、干燥的、不露声色然而含着锋刃的目光，这样的目光也使一些部下如鼠避猫地不敢正视。别看他有时眯着眼，迈着小步，他却在处变不惊中等待对方犯错误，在谈笑之间捕捉一切大有文章可作的战机。……老谋深算的顾荣，在一县之内举足轻重，谁能把他比成“十分无用”的神像呢？

然而即使在封建时代，为官的功过也不是全凭老王卖瓜。有个县官向阎罗王辩解说：“某虽无功，亦无罪。”阎罗说：“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绩考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对顾荣且不必考核三十年的政绩，光就他在对林虹打击报复和小学校舍倒塌伤人这两件事上的“领导责任”来说，叫作官僚主义也不算言重吧？

如果说过去有人自称“为艺术而艺术”，则顾荣也许可以算是“为做官而做官”的类型。他爱做官，会做官，深通“为官之道”。他每天早晨背着手在城里转一圈，在人们笑脸相迎的充满敬意的招呼中，还只是领略一种当家长的权威地位和心理满足；而如同他行动作卧都念念不忘要获得



威信一样，保持手中权力已经成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为了满足这个需要，他尽管做的是共产党的“官”，满口是“共产党的语言”，行动上却已经不惜乞灵于从太极拳悟出的以静制动的拳经，还有旧官场政客那一套恩威并施的手段了。

清代一位当过大官的文人说过：“仕宦热中，其强悍者必怙权，怙权者必狠而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险而深。且怙权固位，势必躁竞，躁竞相轧，势必排挤。至于排挤，则不问人之贤否，而问党之异同；不计事之可否，而计己之胜负。流弊不可胜言矣。”这番十分清醒的话，简直可以一字不改地移作顾荣这个又强悍又孱弱的人物的画像。是工笔肖像，不是漫画。

不过据说“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其实是没有的，然则顾荣也不会单纯“为做官而做官”，当然更不会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了；那么他之“做官”在主观上和客观上究竟是为着什么呢？——“我非鱼，不知鱼之乐”，但是愿与观众和读者一起深思。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载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 两 件 小 事

每遇到吵嘴打架、排队夹塞以至随地吐痰一类事情，我就想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宣传推广的文明礼貌，本来是该在小学启蒙教育中培养的习惯。因此我寄希望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寄希望于教育工作的改革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在跟朋友闲谈教育问题当中，有两件小事使我想了很久。

一件，是一个一年级小学生，趁老师刚走出教室时做了个鬼脸，被老师发现了，叫他写检讨。他写道：“我做鬼脸，不对，我检讨，今后改正。”虽经家长签了字，但老师还是通不过，大概认为不深刻吧。这孩子向邻居阿姨诉苦说：“我才一年级，不认得多少字，不会写检讨！”

写检讨，应该就是书面的自我批评。但是在社会政治生活长期被扭曲，党风和社会风气至今还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检讨这种文体已经很

少同真正自觉的自我批评相联系，却往往流于敷衍搪塞的保证。对于犯了课堂纪律或什么过失的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不去耐心地启发诱导、说服教育，而是简单地施以责令检讨的压力，或者要求他们刻意求深地给自己“挖根源”、“上纲”、“扣帽子”，甚至检举揭发别同学，其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的写作课上大概不教写检讨这种应用文，学生也不会无师自通；那末在老师的敲打和家长们的指点下，一个学生学会写检讨的时候，我看多半不是学会真诚地自我批评，而只是学会委曲求全、对付过关罢了。

我以为，即使成人社会中，也不要迷信“检讨”和“表态”。至于在青少年教育中，我建议把“传统”的写检讨这一条，从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中取消。

另一件事，是一个四年级的班干部，说校长找了他和几个同学，了解他们对班主任的意见，并允诺代为保密。大家不说，只有他讲了点什么，没过几天，他的班干部职务就被免去了。他提问道：“我该怎么办才对？说假话？还是不说话？”

这里，有些情况，假如这个小小班干部的免职，是否由于校长向班主任透露了他的批评意见等等，没有弄清；又涉及校长、班主任工作和学生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一时也想不清，更不能引

出象上述建议那样明确的意见。

然而我把这两件小事写出来，是因为觉得小事不小，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关系到我们要把青少年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人：是从小诚实、不说假话、坚持真理、善于改过的公民和战士，还是看人脸色、违心发言、只求自保、不问是非的市侩和奴才？

我不很了解今天学校的实际，心有所想，如实托出，连同不要再叫学生写检讨的建议，请中小学的师生和从事青少年工作的同志们指正。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载四月三日《中国青年报》）

# 春风吹不掉错别字

北京的红领巾走上街头，寻找招牌广告上的错别字，动员有关的店家一起消灭之。这是义务劳动，又是普及教育。

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不久前开过会，继续强调为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而斗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消灭错别字虽然属于较低的层次，但是首都的闹市通衢是国内外观瞻所系，这也不失为一项维护国格的文化实践。

然而谈何容易！有一条街道马上要接受消灭错别字的“文明街道”光荣匾了，附近橱窗又发现了不止一个错别字，杀风景，令人扫兴！

我于是怀疑“让春风吹掉街上的错别字”，怕春风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因为就在欢呼“让春风吹掉街上的错别字”的报纸刊物广播电视里，错别字正每天不断。报刊是每日必读的“教科书”，广播电视是耳提面命的“教师”，消灭错别字若不

从这里做起，商业服务业中的“学生”的作业，光靠红领巾帮助，会是改不胜改的。

象“月落乌啼霜满天”误为“月落鸟啼霜满天”，“高鹗续《红楼梦》”误为“高鹗读《红楼梦》”这类差错，都是叫人啼笑皆非的。致误原因有文化水平包括基本常识等问题，也还有工作制度不严格不健全的问题；这在报纸刊物是校对，在广播电视是播前监听。书面和口头又有些情况不同，例如“大显伸（身）手”在报刊上出现是明显的同音别字，通过广播却能藏拙；排字工人和报刊校对可以不知道“斯堪的纳维亚”，照排就是，而广播员在语气上断为“斯堪”的“纳维亚”，一下就能听出错儿来。当然，这不属于错别字的范围了。

报刊广播电视中要消灭的技术性差错，还有语法的、逻辑的、使用成语和文言词语方面的，以至语气的、重音的差错。既然有疵，何妨吹毛而求之，理当吹毛而求之。然而积重难返，一朝一夕难以克竟全功。从实际出发，我以为最好还是从减少错别字做起；不说消灭，而说减少，是因为要做到百分之百无错别字，比“万米无疵布”困难得多。至于错别字发生率初步或进一步降低到多少为好呢？这很难说：即使减少到万分之一吧，那意味着五万字的篇幅就还要有五个错

别字！

我希望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界，特别是同一类型、刊期相同、具有可比性的兄弟报刊之间，自愿开展“减少错别字”的竞赛，直到有一天发展为百日、半年、全年“消灭错别字”等等的竞赛。这无疑有助于促进语言文字的纯洁，影响读者、听众、观众至大，而且将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工作作风更加严谨。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日

（载五月一日《光明日报》，题为《从减少错别字做起》。）

# 国格与家丑

什么叫国格？怎么叫有失国格？

通常我们把在国际交往、外事活动中丧失人格、有损国家尊严——换句话说就是给国家丢脸的事，叫作有失国格。

如果在国外的自选商场里小偷小摸，让人发现了，即使不是官方人员吧，作为一个公民给祖国丢脸，从民族自尊心出发，也可以叫作有失国格，广义的国格；倘是政府选派的出国人员，即使不是“特命全权”的国家代表吧，人家也把你当作国家公务人员的代表，丢个人的脸的同时，也丢了国格；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派出这样的鸡鸣狗盗之徒呢？

这个道理容易看清。而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派出不懂行的负责工作人员到国外考察，又怕担公费旅游的名声，为表明是出公差必得“带着任务”，以致胡乱地“谈判”，胡乱签个合同，或者接



受外国厂家的小恩小惠，只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买下人家的东西，就可以再派十几人、几十人的队伍，其中又搭配一批不懂行的、醉翁之意乃在“山水之间”的“考察者”，如此等等，至今一般还没有被当作有失国格的事看待，然而在国际观瞻中，有关的个人固然不齿于人，作出这样派遣的有关部门，又是什么形象？派出人员“尸位素餐”或贪占便宜，虽还不一定够得上“丧权辱国”之罪，确也把国家的脸面丢光了。

光从这个角度着眼，煞一煞滥派出国风也是必要的。

不过，从偷鸡摸狗到颠预贪婪，在国外有辱国格的人，难道都是淮河以南的桔子，“过淮北而为枳”，是因为国外的水土不好，“诱发”出种种丑行么？而同样的偷鸡摸狗、颠预贪婪，只要是在国门之内干的，没在异邦人士面前丢人现眼，就不算有失国格，顶多算是不可外扬的“家丑”么？

举凡“家丑”，无不有损“国格”。

对外才讲国格，在国际交往、外事活动中才讲国格，这就把国格的意义降低，似乎只具有外事活动守则一类的纪律和道德约束作用了。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党也有党格。

我认为，倘是国家工作人员，人格也就联系着国格；倘是共产党员，人格也就联系着党格。

这是不一定走出国门或面对“洋人”才出现的新问题。

这不算求全责备吧？

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

（载四月十九日《羊城晚报》）

# 说 嚼 蜡

自学而没人指点，容易望文生义，误解曲解。小时候囫圇吞枣地读书，第一回把“味同嚼蜡”当成了“味同嚼腊”，往后很久都没察觉，反生了疑问：嘴里闲空时弄一块腊肉嚼着，就象牛肉干或口香糖，不是津津有味的事情吗？怎么看上下文总是乏味的意思，莫非北方人吃不惯腊味？

后来知道典出《楞严经》，所嚼的蜡，从虫不从肉，是蜡烛之蜡，一想，豁然贯通：莲座边，蒲团上，黄卷青灯，百无聊赖，念念有词之余，没有口香糖或牛肉干或腊肉可供咀嚼，就把眼前现成的蜡烛滴下的蜡泪，捡起一片两片嚼着，于是越发地觉得索然寡味了。然而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虽不是小沙弥，视听之间，却也不免和尚念经似的照本宣科，套话连篇的八股论文，无病呻吟或诘屈聱牙的诗歌，胡编乱造或矫揉造做的小说，以至看某些电视，听某些广播，……都

使人有嚼蜡之感。

蜡之为味，比鸡肋还不如。尽管也许是精心炮制的。

怎么办？不嚼就是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

（载六月十一日《现代人报》）

## 幽 默 辨

读了《文学自由谈》上发的一篇谈性文化的文章，其笔锋一转，扫到宋代的朱熹说：他就是主张“灭人欲”的卫道者，他有许多钳制妇女的手段，如规定妇女出门须头顶花帕遮脸，帕中仅留两小孔；住家门上须挂竹编门帘，妇女不能走出竹帘，也不许随便窥视。在他鼓吹下，中国历代不知制造了多少节妇烈女。但是，据说他本人却曾谋夺过人家巨万家产，诱引过两个女尼为妾随在任上，云云。

我从而想起游武夷山的见闻。在九曲溪的五曲北岸有朱熹的紫阳书院遗址。这位“学达性天”的大儒，“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别人认为，他也自认为“尽有山中之乐”。而当地传说他同一个狐狸精有私，至今把附近一个洞（可能叫真武洞吧），指名叫“狐狸洞”。设想先生秉烛，狐女敲门，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幽默。

假如确有本事，或是邻女，或是娼妓，而托为狐狸精，那是含蓄的微讽，不失为幽默。若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只是针对朱夫子的满嘴仁义道德，“男女之大防”，创为此说，那就带有辛辣味，然而仍不失为幽默。

当事人却不会感到幽默的。朱熹倘有所闻，恐怕会忘记“制怒”，气冲冲地追查“谣言”。至于女方，不管是武夷山的狐狸精还是随官到任的侍妾，也都不会发笑，哪怕是一丝丝。

幽默，是一种超脱于利害的，对于是非美丑特别是对于真伪的洞察明辨，经常流露在对现象与本质、因与果以及言行、表里相矛盾的含笑揭示之中。

幽默感是由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激发出来的。生活中的矛盾现象所激发的却不一定是幽默感。《李有才板话》里的“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东西两头贫富悬殊，这是一层；这样的社会现实跟所谓模范村的名义的差距，又是一层。揭露这矛盾，已经不是幽默，而是讽刺。讽刺可以发笑，但往往是苦笑、冷笑甚至含泪的笑。李有才是喝稀饭的乡邻的代言人，他的感情不可能超脱于具体人际关系之外或之上，所以幽默不起来。

讽刺又因所介入的矛盾的激化程度不同而分

为不同的档次，激化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那就是诅咒、排击与声讨了。

云南泸西县两个科局级干部，用公款大吃大喝，醉后掉进粪池死掉。事后应家属要求，竟按因公死亡来料理后事，连“追悼”带“补助”，花掉四千多元，报上标题《花圈掩盖不了脏官臭气》，有人认为幽默，我说不然。吃喝公款，可恶而不可笑，既死可免于追究，居然算作“因公”，又耗公款，更加可恶而不可笑。可笑的才是幽默，可恶可恨的不是幽默。可恶可恨的事情多了，幽默就少了。对可恶可恨的事情若采取幽默的态度，一笑置之，就会变成油滑，至少是可厌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

（载四月十六日《今晚报》）

## 西施故里篇

读到一篇《西施故里考辨》的文章，很有趣，如读浙东游记，如读历史小品。西施故里在哪儿的争议，由来已久。浙江萧山县有西施庙、苎萝亭、浣纱溪、西施坂，相邻的诸暨县也有浣纱石等古迹；这些实地实物，不象“大观园”那么杳渺难寻，而双包案多年难断。这篇文章考证出西施的老家应该就在今浙江萧山县南二十五里通济乡境内，苎萝山下苎萝村，有文献足征，又有古迹可证；同时考证出关于西施故里在诸暨县南五里苎萝山的说法，出于好事者的附会，多年来以讹传说的来龙去脉。

这篇考辨文章对我有说服力，然而持“西施出诸暨”说者却未必会承认这个结论。

在为这个争鸣所体现的学术自由空气感到高兴的同时，不由得忽然一闪念：西施的故里不过小事一端，值得这样大费笔墨吗？这岂不近似曾



经批判过的，校订一个字就命同发现一颗星吗？不过转念一想，校订一个字的意义虽然不一定赶得上发现一颗星，而校讎勘误也确是需要人去做学问，参予论争的又只是少数的人，并没有兴师动众发起考辨西施故里的群众运动，造成劳民伤财的后果；尽管不是古代史上的重大科研项目，但是做为地方志工作中乡土历史考察的一部分，或是旅游资源开发的一部分，都是未可厚非的。

围绕西施故里一类问题的争鸣，的确不是大课题。虽然这类笔墨官司是古已有之，算不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产物。不过在“文革”当中甚至“文革”前一段时期内，不是连这样的争鸣也没有了吗？二十多年前一篇题为《京华何处大观园》的文字，曾经被说成是为什么什么翻案，又为什么什么鸣锣开道的东西！相形之下，能在西施故里问题上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也就“慰情聊胜于无”了。

然而，为了结束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全面专政”，为了争取发展社会主义学术文化所需要的正常环境，我们已经付出了多少代价啊。因此，在文、史、哲、经、政、法的广阔领域里，在考辨西施故里等等的同时，难道不应该有更多的学者专家就一些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的问题展开切切实实的争鸣么？

从完全没有争鸣，到有所争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如果只是在西施故里一类问题上议论风生，而在一些更大的问题上缺少充分展开的深刻的论辩和交锋，那还不是我们应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象西施故里或一字之微，去伪正误，也属必要，并非“点缀”；但是如果只是这一类题目上有鸣有争，显得热闹，则“争鸣”就有变成只是一种“点缀”的危险了。

至于西施故里的问题，自不妨继续商榷下去。即使为这篇文章所考辨，诸暨县的西施古迹，“实际上，是自唐以来谬说实物化的体现”，然而自唐至今，也已千年，所谓“好事者的附会”，能历千年不衰，可见在越东人民心目中，这一个苕萝山、浣纱溪的女儿早逸出残编轶事而不泯；这不会仅仅是个丽质冷容的美人，更不会有些人所描绘的女间谍。这个现象所蕴含的民族心理值得玩味，两地的西施故里我以为可以并存。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

（载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附〕

## “西施出诸暨”

——《越中杂识》拾误

高 逸

西施故里在诸暨本是历史的定论，但近年忽然掀起争论。这个争论似乎同《越中杂识》有关，当然，也同当前的一股旅游热有关，对此不屑论及。《杂识》是根据清乾隆抄本标点出版的，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距今一百九十余年。作者西吴梅堂老人，乾隆时人，生平无从考，从自序看，不像是越地人。《杂识》对于了解明清时绍兴府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尤在古迹记述方面，往往囿于识见而致讹。如书中的苕萝山条就是不核古籍之故。《杂识》认为，诸暨苕萝山与萧山苕萝山，考《后汉书·郡国志》当以萧山为是，诸暨苕萝山俗称张家山，辩者以萧山为真云云。这种说法均本于康熙年间成书的毛奇龄《萧山县志刊误》，而且连文字也类同，梅堂老人所称的“辩者”即指毛奇龄，毛氏喜欢做翻案文章，但往往是错误的，所谓“西施出萧山”

就是毛奇龄掀起的波澜之一。其实,《后汉书·郡国志》自始至终都没出现“苕萝山”三字,何来为是为非,萧山苕萝山见之于文献是南宋《嘉泰会稽志》。笔者查阅了不少史书,并走访实地,考核诸暨苕萝山是否有其他称呼的问题,结果除南北朝宋《会稽记》中简称“罗山”之外,再无他称,张家山之说当系杜撰。微妙的是,萧山苕萝山之北却有张家坂之名。对于毛奇龄的学风,历代学者深为不满,梁启超说:毛奇龄“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

其实,苕萝山的真伪问题,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十一早已作了辨析,根据南北朝《会稽志》、《舆地志》,唐《十道志》,北宋《太平寰宇记》、《越州图经》等史书和诸暨所存古迹,诸暨苕萝山是出西施、郑旦的苕萝山,并把考证文字书于志上。萧山虽有“苕萝山”之称,但迄今为止,却没有发现萧山苕萝山是出西施、郑旦的记载。历史上的《萧山县志》也没有认为西施是萧山人。从西施赴苏州线路上所产生的一系列西施古迹看,萧山苕萝山显系纪念性质名称。《嘉泰会稽志》是由施宿主纂,陆游父子修订,记事详核,是历代所称颂的名志。有关西施的古迹,南限诸暨,北到

苏州。如果西施出萧山，那末，她被献送苏州，在地理方位、交通线路上，均不必经过诸暨，诸暨的众多西施古迹就不可能产生了。

一般地说，凡以明清志书证之于秦汉史事者基本无效。这是因为明清时代所能看到的古籍，今天一般也能看到；其次，与秦汉相距太遥远了，何况是春秋战国之事。明清以前，西施、郑旦的故里记载是十分明确的。清初，毛奇龄力图翻案，悔堂老人蹈袭其误，曾搅起涟漪，不久即被澄清。《越中杂识》的出版固然是件好事，但有的同志不明这条史料的来龙去脉，却在此大做文章，这就以讹传讹了，也是对事物本质缺乏全面了解所导致的。为此把历史上的个中因由涂写出来。以供读此书者参考。

（载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文汇报》）

# 当代可以入史

唐弢先生认为当代文学可以概观、概述，而不宜有《当代文学史》之设。引申开来，自然“当代史”的提法也不通。我不治史，读史也偏重于所谓稗官野史，压根儿没想到要参与这方面的议论。

今天早晨听了关于“四·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广播新闻，上午到三联书店取样书，又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忽然深感自己缺少有关的历史知识。仅隔十年，恰在当代，如果没有人根据足够的史料，以可信的史笔，写出这一段——或者就仅仅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强大抗议运动的历史，光靠一己的见闻所及，怎么能达到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呢？

于是头脑里跳出几个字：当代可以入史！

一九七六年四月前后，我在北京，籍隶于姚文元直接控制的一大新闻单位。清明节前数日，

党组织已经把“文元同志的指示”逐级下达到基层党内外群众，如临大敌，其势汹汹，显出了“勿谓言之不预”的杀机。后来种种，无论是敲锣打鼓欢呼“两个决议”，还是关门开会追查“反动诗词”，就不必再说了。那时候我早已不是共产党员，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良心未泯、党性未泯的党员，也都感到无能为力，也许在内心深处呼唤“党在哪里，党的正确领导在哪里”的并不止我一人。

十年之后，天安门英雄碑下，秩序井然的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来进行有组织的悼念活动，比起当年的血雨腥风，的确是两重天地。抚今思昔，我对那一段历史——就说天安门事件吧，其实只有些感性的认识、情绪的记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孩子问我：怎么理解“天安门事件是在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以及党提出的正确主张的指引下发生的”？我除了援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几句有关的话以外，一时竟也说不出许多翔实的事例来。那个孩子当年还小，没有“卷入”，而我至少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还在天安门广场流连了一个下午，今天却停留在亲历的见闻，此外则只是些概念的认识上，实在不免惭愧。

按照习惯，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就进入当代的范围。假如当代不宜入史，那我们难

道就将长久地明于知一九四九年前，而昧于知一九四九年后了吗？这种情况，什么时候算一站呢？

所以我认为，当代不仅可以入史，而且应当入史。应当写出有观点、有材料的《当代史》，作为青少年的教科书，而我们这代人也跟着补补课。如果从宏观上看，现代史是昨天，近代史是前天，古代史是前天以前的过去，那末当代史讲的就是今天。今天当然是从昨天、前天以至大前天来的，青少年应该有从人类起源、原始公社起，从黄帝战蚩尤开始的系统历史知识；然而我以为让他们了解“当代史”是必要的甚至首要的，因为不立足于今天，就谈不到面向未来。

史学家们，教育家们，研究历史的叔叔阿姨老师们，给我们写一本真实的当代史吧！

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

（载《随笔》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 说“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这话自然是“先生”说的无疑。头一个说这话的是孔子，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后生来日方长，先生来日苦短，年龄优势首先可畏。“先生”先死，“后生”后死，这是一般规律。孔老先生比弟子颜渊大三十岁，但是颜渊“不幸短命死矣”，死在先生前面，那是贫居陋巷，簞食瓢饮，生活、学习、工作条件都很差的缘故。子夏、子游、子张、曾子这些学生，比他们的老师晚生四十多年，孔子去世的时候，他们才二十多岁，颜幸、冉孺、曹卹、伯虔、公孙龙年仅二十，他们更是典型的后死的后生了。

孔子晚年已经声誉很高，为“天下”所共尊，他为什么要说“后生可畏”呢？据解释者说，他是勉励后生们抓紧青壮年时期干出点名堂，超过老师，趁着不到四十岁，年富体强，气盛志锐，

“无所不可为，无所不可成”，“安知不如我今日！……乃可过我而令吾畏之者也”。

孔子不认为自己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希望后来者居上。如此明达，怎么会“怕”后生呢？所以解释者说“后生可畏”的“畏”字，不是怕，而是“敬而服之”的意思。

我们把经常敲打我们的朋友叫“畏友”，固然可能是敬服，其实首先还是怕，怕他的批评太中肯，驳不倒，以致不得不服。

另有一种“后生”，却是叫人畏而不服的。南北朝的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对唐代说算是前贤了，可二百年后还遭到唐代一些后生的贬损；杜甫抱不平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畏他什么？畏他气势汹汹，“破字当头”，可见这种后生也是古已有之，然而掂量一下，破坏有余，建树毫无，归根到底，“斯亦不足畏也已”。

不足畏而说畏，这是杜甫的反讽，庾信这样的前辈们死而有知，倘真也象孔子那样认为“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并认为“后生可畏”的话，其所“畏”的后生应该就是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又有所发展的杜甫们，和被杜甫誉为“清新庾开府（信），俊逸鲍参军（照）”的李白们；只有他们才当得起前贤的“畏”。

如果“以意逆志”出入不大，我以为孔子所说“后生可畏”的“畏”字，不是提心吊胆的惧怕，而是爱惜备至的殷望。一个深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哲人如孔子，不会偏狭到害怕后生超过自己，也不会虚弱到担心自己安身立命的道德学问将因后生的精进而一败涂地。他对他所爱的弟子，总该希望传薪有人，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可怜虎子变毛虫”的。我相信他说“后生可畏”这句话时的心态，是跟他带着后生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时候同样自信而从容愉快。

至于死抠字眼，认定“后生可畏”，于是着着实实对后生——青年、学生以至一切后来者紧抱着一个“畏”字的，那是后来的大人先生们的事了，与孔子无关。后生越是有胆识，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人言，这些先生们越是觉得：可畏！

而直言不讳地说“后生可畏”的先生不失为实事求是的长者。另有一种先生，也许并不说“后生可畏”，相反还引经据典地说什么“畏者，敬服也”，“后生可畏”就是“后生可敬”也，等等，然而私心里把有所做为的后生们看成眼钉肉刺甚至洪水猛兽，这倒真的该叫作“先生可畏”了。

后生可畏，是因为后来者将胜过先行者。先生可畏，则是因为他们要阻挡历史或学术的进步。

这样的可畏的先生，加上如杜甫所指的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后生，古往今来都有的，他们会给广大后生的作为和有作为的后生们设些障碍，找些麻烦；但是历史毕竟在不断向前，因而我们看到的，总是一代代后生超过一代代先生：“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岂止今胜于昨，将来更必定胜过现在。而那些高瞻远瞩，扶持后生，推动历史前进的先生是不朽的。

时至今日，却拿二千多年前孔子的话来发议论，做文章，足见冬烘脑瓜，书生气十足。还望今天的先生和后生（历史地看，先生也是后生，后生也是先生）们指正。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

（载五月四日《光明日报》）

## 春末漫笔

今年的北京，“清明刮了坟上土，要刮七七四十九天”，有时候风沙大到五六级。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就是一九六六年那个“多事之春”，天气是怎么样，风沙大不大，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不是我今天犯了邓拓有一篇著名杂文中说过的“健忘症”，而是当年“政治气候”变化得紧，让人顾不上留心“自然气候”了。

那个“多事之春”是紧接着头一个“多事之秋”的。一九六五年十月下旬，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据说这就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后来说“文革”正式开始是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算起，那末可以说序幕就演了半年多。起初有些事情，象围绕着“二月提纲”的斗争，只是在上层进行，一般人并不知道。到四五月间就闹出来了。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的文章把林彪委托江青召开

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一套端了出来，五月八日高炬、何明、戚本禹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接着不容喘息，五月十日姚文元《评“三家村”》在全国报纸、广播中同时发布，它的副题是“《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是仅仅批判这两本书和三位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吗？姚文元说的是，凡是怎样怎样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那时候有人就猜，这是冲着谁。等到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一案传出来，就说原来姚文元的“四家村”云云也不是随便一说的。

从那以后，对于姚文元一流发表的署名文章，大家都要猜一猜：“矛头是指向谁的？”比如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一月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同年九月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特别是后一篇，再书生气的读者也知道绝不是评两本书了，何况文中一个小题就是“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可大家记得陶铸在这年一月，就是《红旗》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时候，已经被“揪出来”，被打倒了，上街的大标语也就封他为“反革命两面派”。所以九月这篇大批判文字所提出的，

已经是“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搅乱了我们的阵线”了，姚文元说，“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他说的“右派”即“陶铸式的人物”究竟何指，也是许多人很猜了一阵的。

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大家读书看报，都要学会看幕后文章。我至今说不清这在广大的识字的人们当中，是一种政治敏感的训练呢，还是智力上、精力上的浪费？

昨天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艾青怀念胡风和田间的文章，真够炉火纯青了。我重读一遍，从语调感到了老人的仿佛了无波澜的平静的心境。此刻，我回忆着二十年前火药味的岁月，剑拔弩张的大批判，而心情居然也平静得了无波澜，不禁笑问自己：我也“炉火纯青”了吗？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

# 车祸与人祸

全国九百人死于车祸，这是今年三月份的统计。四月份的数字还不知道。据说全国城市的交通事故，总的趋势在增多。

交通事故有种种：有自行车撞行人的，自行车相撞的，也有汽车撞火车的；然而所谓车祸多数是指汽车撞了行人，或撞了自行车、人力车、畜力车，也有汽车相撞的，去年我和一些朋友乘坐的小旅行车就被一辆大卡车所撞。具体的事故中责任有主次，但从受害的轻重看来，车与车相撞，受害重的一般是小车；而车与人“相撞”，受害重的总是被撞的人，当然，肇事的司机也有受伤甚至车毁人亡的。过去把肇事的汽车叫作“市虎”，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市虎”不仅在城市里，也在乡村特别是城乡之间的公路上驰骋伤人。

“市虎”毕竟是由人驾驭的，所以车祸也是



人祸。专就司机一方来说，违犯交通规则，酒后开车，过于疲劳等等，都会导致事故。

我怀疑，或者说、我不怀疑眼下全国急剧增加的新司机中，有一些并没有掌握熟练的驾驶技术、没有熟谙交通规则却领得了驾驶执照的人。考试不及格而能得分混到文凭的，那是考场舞弊，主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缘故。在“路考”当中有多少这样的舞弊行为呢？有多少基层主管单位的人员受贿滥发了驾驶执照？在检查所谓“行业不正之风”的时候，是否对此作了检查？

给不合格的司机发照放行，这是造成车祸的原因之一，地地道道的人祸。祸及被车撞伤撞死的人，也祸及开车撞人的人，很可能就包括行贿买驾驶执照的不及格的司机。

行贿受贿，互相依存，究竟谁是主动谁是被动，真也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然而苍蝇不叮没缝的蛋，而且矛盾总有主要方面；如果没有暗示或默许，饶是再发财心切的用车户也不敢冒冒失失地来“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至于敲诈勒索自然远远超过了暗示或默许的限度，在以权谋私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地方，公开的或变相的贿赂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惯例。这些在以权谋私上“不愧英雄称号”的人，“理直气壮”，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早已不是“腐蚀”对象，而

成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风气进行腐蚀的主力了。

说起“行业不正之风”，难免想起各地已经揭露或尚待揭露的诸如“电霸”、“水霸”、“路霸”之类，进而想到“恶霸”。查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第十条：“恶霸。凡称恶霸，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查有实据者”。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某些基层又出现了新的可称恶霸的现象？自然，这已经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正之风问题，而是一种更严重的人祸。但已离开车祸的话题，姑存而不论。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日

（载五月十八日《工人日报》）

## 读《艺海沉浮》

这是一本质朴平实的书。虽然只是一个人艺术生涯的自述，我从中却仿佛读到半个世纪来北方鼓曲的沧桑录。

孙书筠同志一小儿跟父亲学京剧，唱老生，因为家穷没钱置行头，改行学唱京韵大鼓。十一二岁小姑娘时就上园子演出了。那是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间的事。从为了挣钱养家，到懂得争强好胜、拚命学艺，她的青少年时期整个是在挣扎中奋斗的。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从欧阳予倩同志那里听说周恩来同志讲的，旧社会总是侮辱旧艺人，新社会新时代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听了这句话，她热泪盈眶，她感到被人尊重了。觉醒了的人的尊严使她没有辜负这种尊重。从那时起，她自觉到应该为人民、为这个新社会做些什么。从那时起，即使在十年动乱的急风暴雨中，她不但对同命运者如马连登老人没有

昧着良心，遵命乱咬，而且对五十年代给过她启蒙、教育、帮助的干部和同志们始终抱着尊敬和感激，不肯随梆唱影，落井下石，如一些翻云覆雨者之所为。这是对事实的尊重，对道义的尊重，也是自尊自重的表现。

我从一九六〇年结识了孙书筠，印象大致如此。在有些人眼里她永远是不能跻于“革命文艺工作者”之列的“旧艺人”，但是我看到她在分明的歧视和压力下一直保持着这种自尊自重，一丝不苟地钻研她所热爱的“冷门”——甚至不止被当作冷门而是随时等候“淘汰”的京韵大鼓，还惦着有所创新！

并不从事曲艺的青年演员，并不吃文艺饭的年轻人，我也把这本书推荐你们一读。我从这本书体会到一个仅仅把艺术表演当作职业的演员和一个把艺术创造当作生命的艺术家之间的差别和距离：一个曲艺演员（比如唱大鼓的）不等于一个曲艺艺术家；广而言之，一个写诗的不等于一个诗人，一个教书的不等于一个教育家……

孙书筠学唱开窍很早，但她如果不是多年一贯从不偷懒地从老师、同行、听众那里认真汲取营养，如果不是中年以后更自觉地全面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素养、艺术鉴赏水平，借鉴姊妹艺术，并求触类旁通，她就不可能在自己这一行里由

“学、会”而臻“精、化”。

尤其是“咱们这腔血倒在台上也得要下好儿来”的精神，我以为是一切真诚热爱艺术、甘愿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看到这句话，我始而一惊，继而惭愧。我不正是缺少这样的精神，干什么都浅尝辄止吗？借口“业余”，象“玩票”似的，却比全心全意“玩票”的还不如，这就注定不能成器。我一度有缘跟孙书筠、钟舜华、赵玉明和马增芬、马增蕙几位共事，她们曾经恳切地期望我能写出点象样的唱词，但我心不在焉，没能踏踏实实学习鼓曲，也就没能给这些在我倒楣时毫不势利、平等待我的同志们真正帮点什么忙，每一想起，深心里常有一种负疚之情。

孙书筠同志这本《艺海沉浮》（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只是简洁地回忆了自己五十年的经历；希望她对自己艺术实践和京韵大鼓艺术规律有所总结的第二本书能早日写出来。我还希望马连登同志生前录音的西河大鼓《杨家将》，这部可称汉族英雄史诗的长篇大书能够早日记录整理出书面世；希望有关已故和健在的曲艺艺术家的传记、回忆录的写作和出版能得到应有的关注。曲艺艺术的史料搜集和理论研究，国内有头等的条件，似乎不该落在海外学者的后头；况且这不光具有

文化积累的意义，发展新时期的曲艺也还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虽然比起建国初期来，曲艺是远远不受重视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

（载六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 晚说了三十年

北京第二热电厂的高大烟囱，矗起于天宁寺旁，使天宁寺塔不再是旧时光景，天坛南里的楼群联翩而立，使圜丘坛不再能望穷四极、遥听八荒了！

这是最近在扬州召开的全国首届历史文化名城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会上发出的感慨。多少历史文物、古迹名胜将在一些实用性建筑设施或低劣的仿建项目中被淹没、被排挤、被亵渎、被损坏。

我以为这些有用的话晚说了三十年。

只消举一个例。请到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边，向西北岸五龙亭一带举目遥望，原来是长空一碧，空濛邈远，自从三十年前背后突兀出现一堆办公楼，高高压顶，昔日景观从此消失，水边亭阁相形见绌，而隔水远眺的人，也都目不暇而神不怡了。

中国建筑讲“借景”：那办公楼可以从楼窗借北海的景，但“西北有高楼”，北海五龙亭要取万里云天作背景却再不可得。

三十年来北海的游客，何止万千，对风景点上的大煞风景事，难道就全都视而不见么？当然不是。但事实既成，又如之奈何！然而办公楼建设之前，选址之际，就没人有见于此么？有没有内行人进言劝阻呢？局外人不知道。不过即使有建议，也是必定没被采纳的。想想当年，正是山雨欲来，古建筑学者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少说为佳，噤若寒蝉，也是可以理解而不忍苛责的。

总之，晚说了三十年。不然，尽管不能杜绝类似悲剧的重演，总会提醒于未然。

三十年既往矣，而来日方长。然则这话说得也还不算晚。如果不仅在研究会上说说，不仅在座谈会上说说，不仅面对既成事实作为“马后炮”说说，尤其不仅是说说而已；而且在作城市综合规划的时候说，在讨论风景文物名胜古迹地区建设计划和总体设计的时候说，特别是在有决策权、有否决权的场合，甚至在有权作出重大决定的领导人对于保护国家山川文物财富的意义缺少认识的情况下，勇于陈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什么断不可行，那将是功莫大焉。而能否做到这一点，确是对原则精神和道德素质的考验。



其实这种考验随时围绕着许多有关国家人民长远利益的问题在进行。并不限于如何从全面效益上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和发展的问題。在后者的讨论中，在扬州与会的老同志们纷纷发言了，今后呢？长远地看来，则一切将取决于中年以至青年的同志一扫明哲保身的心态，坚持一切正确的意见，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不要再过若干年后回首往事，遗憾地摊开手，说：“唉，当时该说的没说！”

附带说一句，北海西北边的办公楼，待建筑年限届满需要更新时，理所当然应该拆迁别处，以便恢复北海西壁景观。这是要待当时的中青年成为老人的时候吧。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日

（载五月二十七日《中国旅游报》）

## 《三国》一锦囊

虽然开卷未必有益，而象《三国演义》这样洋洋百万言的巨著，锦囊妙计，层出不穷，全书也不失为一个大锦囊，各方人士都可以探囊取物，各取所需。

报载日本企业界人士把此书视为宝典，认为其中审时度势、知己知彼、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种种战术中，很有些战胜敌手的秘诀。据说松下电器公司的成功，正是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战略的结果。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郎则说，现代企业家若能仿效刘备爱才用才，就可以小制大，以弱胜强，云云。各种以《三国演义》为主题的管理学著作在日本竞相出版。看来东邻在这方面“古为今用”、“中为洋用”是捷足先登的。

我们的国人，就没有向《三国演义》取经受益的么？可惜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

不易学，也没便宜可占，“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却还得舍得孩子，倒是“宁教我负天下人，莫使天下人负我”这一条，只要心有灵犀，便可立竿见影，私淑书中曹操的大有人在，只不过没有就这个题目著书立说罢了。

书里的曹操，运筹演谋，无一不表现出他“乱世之奸雄”的杰出才能，特别是支撑他成为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的两面手法、斗争策略。借头安民，借刀杀人，只是信手拈来略施小技而已。而通观《三国演义》全书，尔虞我诈，翻云覆雨，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司徒王允“巧使连环计”，借貂蝉离间董卓、吕布——比起曹操，王允只是小巫，而且以失败告终——手眼神通，已经足够精彩。无怪为曹操辩护者说：“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三国演义》真实地刻划了三国群雄间的“斗斗斗”，斗力、斗智、斗权术，成了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形象教科书，在这一点上它与一切旨在“资治”的史鉴相通。治者，掌权，治民；封建的“政治艺术”，归根到底是权术，更不排除阴谋诡计的运用。千年以下的我们，回首三国风云，说那大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当时他们内部之间，彼此正是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的劲敌。

《三国演义》中朝秦暮楚，分分合合，忽而联姻，忽而反目，过河拆桥，煮豆燃箕……一切人际关系都围绕权力转换，浸入“非常政治化”的冰水之中。然则读《三国演义》，热心军事而不熟习兵书的如明清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固然有不少人从中获得启发，据说如此；而热心于借鉴封建统治者纵横捭阖、倾轧吞并的政治经验的人，也自可把这本书当成课本。

小时候听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懂得那是说年轻人血气方刚，“缺心眼儿”，看《水浒》容易兴犯上作乱的心，然而老不看《三国》又为什么呢？似懂非懂地听长辈说，一是上年纪人阅历多，“心眼儿”本就多了，再看《三国演义》的勾心斗角，会更加瞻前顾后，趑趄不前；二是上年纪人已经“心眼儿”不少，若再学了三国人物的用尽心机，老谋深算，怕就要变成老奸巨滑了吧。

不少的中国读者在“看《三国》掉泪——为古人担忧”的同时，还有从一切书本接受教育的习惯。不但向所谓正面人物学习，也会模仿反派角色。“文革”中一代青少年动用私刑。是谁传授还是无师自通？原来竟是取法于《红岩》中关于中美合作所酷刑的描写。举一反三，从宣扬刘汉正统的《三国演义》、偏偏学的是曹操的所谓“政

治智慧”，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国”俱往矣，而锦囊犹在。何所取舍，何所施用，此中消息，令人深思。资产阶级政治学自然为我们所不取，无产阶级政治学还在草创之中，《三国演义》是不是因此才得以发挥封建阶级政治学通俗补充教材的作用呢？。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六日

（载《美育》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 小议死后之事

我们常说“告慰于死者在天之灵”。其实说者、听者都明白这只是一种修辞方式，并不是一下子成了“有灵论”者，连普通老百姓都相信“人死如灯灭”，何况有科学文化常识的干部及其家属们呢？

追认个别曾经申请入党，也符合党员条件、但生前未能如愿的死者入党，是一种纯属精神补偿的安慰。死者其实是感受不到死后“光荣入党”这份“哀荣”了。揆情度理，死后追认的做法，也确实不是为了什么“在天之灵”，而主要是为了影响于活人：一方面寄托哀思，一方面意在树立表率吧。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带着点生前欠情、略事弥补的意思。

不过，如果一地一级党组织一个时期发展的新党员中，竟有若干“死魂灵”，当然也是一种遗憾。

如果说追认入党总还包含着鼓励未死者在有生之年学习死者生前为争取入党所作的努力的话，那么，为死者“调整职务级别（当然是往上调，不是往下调）”，是否又意味着鼓励众多的生者一息尚存就不要放弃什么努力呢？

据《解放军报》报道，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尸体超期存放的越来越多。今年以来，一位军职干部的遗体竟存放达九十九天，还有八十四天、五十五天的不等，“都是因为家属提出要为死者调整职务级别、将外地的子女调进北京或扩大住房面积得不到满足，不让火化的”。

封建时代名将重臣死后有蒙皇上追封晋爵的，也无非是个“哀荣”，不会再增建府邸。《红楼梦》中为图秦可卿丧礼上“风光”些，她丈夫贾蓉承三代余荫，临时捐了个“御前侍卫龙禁尉”，却还得掏出一千五百两银子。遍读正史与稗官，还都不曾见过公然“以死人压活人”，人死了还要升官晋级这样理直气壮，形同“讨债”的。

当然，在这里死者并没有伸手。即使功高盖世，真正的革命者也不会讨取“献身革命”的酬金，更不会认为国家和人民欠了自己什么。难道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家属倒有还不清的债务吗？

呜呼！死者已矣，遗体竟成了“人质”以至“筹码”。“哀荣”“哀荣”，何“荣”之有！

《解放军报》上的文章说得对：“死者家属这样干，实际上是玷污了死者光荣的革命历史”。

愿一切后死者三思。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八日

（载六月十日《北京晚报》）



# 人 咬 人

中国历史上不乏吃人的记载。战乱之年不必说了，中唐北宋不算末世吧，白居易诗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水浒》中孙二娘卖人肉包子，都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小时候，远距离地心慕梁山好汉，暗地却心存恐惧，设想我若在当时当地，生怕无意中挨了李逵的板斧，或被孙二娘胡乱做成肉馅也。

后来读《狂人日记》，才知道满本中国历史，在“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在别的文章里，更直说中国是安排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他呼吁捣毁这厨房，掀翻一切人肉的筵席。

新中国不复是旧中国。然而十年的“文革”动乱中无疑又重现了“人吃人”的社会相。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没落垂死的东西总难免沉渣泛起，一时把水搅浑。

这几年在新旧体制并存转换的复杂过程中，时发阵痛，本在意中。从锐意改革者们的遭遇中，我发现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现象：“人咬人”。

报载有一个连年亏损的工厂，在一个改革带头人挺身而出，承包以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当年就扭亏为盈。然而原来不肯接受承包的原厂长，对这个锐意改革的新厂长却由嫉妒而怀恨，搞小动作，设置障碍掣肘为难，进而发展到造谣诽谤，恶意中伤，所谓“恶人先告状”，一度闹得满城风雨，“曾参杀人”。

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八分钱（邮资），查半年，调查花掉几千元，生产损失多少万？不明不白等来年。”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京、沪、川、皖四省市的统计，曾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青年厂长（经理）中的二十一位青年改革者，有一半受到过各种“调查”，致使他们处境维艰，犹如戴着脚镣跳舞。

调查研究本是实事求是之举，只应提倡而无可厚非。但“调查”组满天飞，改革不胜其扰矣。那些按兵不动，不改革，死气沉沉的企业，很少有什么“调查”组光临，日子倒过得安逸。有些人捕风捉影，意在调动从改革者身上找毛病的热情，而检举有功、诽谤无罪的种种事实，反过来又助长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的积极性。于是，

致力改革者不胜其扰矣。

你以为“人咬人”不是“人吃人”，便可等闲视之么？殊不知一口两口地咬下去，把人咬死，无异于吃人；咬人的倘有权位，则所咬不止一二人，入骨岂限三两分；况且有些咬人者，在例如“文革”的非正常年月怕就曾有吃人之行，而至今不泯吃人之志，一旦有条件时还是要吃人的。咬人与吃人，一字之差，一纸之隔耳。

有人把这类“人咬人”，归之于国民性云云，我不敢苟同，但以为多联系当前改革中的各种人事现象做些考察，必能有更深的理解。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载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改题《改革者的遭遇》，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改。）

# 咬文嚼字

冯英子先生来京，过我处小坐，说起他写一篇短文，批评上海的招贴“横穿马路必须从人行横道线内通过”太罗嗦，认为只写“过马路走横道线”就够了。

我说北京有一条招贴叫作“车走车行道 人走人行道 各行其道”，虽也罗嗦，却似稍有“文采”，只嫌略带一点“舞文弄墨”的架势。

其实宣传市内交通秩序的文字，看来都曾经反复斟酌过。据说原来有一条“为了您的幸福请注意交通安全”，后来经人指责：“只顾自己的幸福，就不顾别人了吗？”于是赶紧改作：“为了您和别人的幸福，请注意交通安全”。总觉有点别扭，也许“别人”改为“大家”就顺口了。

就这几条来咬文嚼字，不是因为市内交通管理部门在文字上不讲究，而是因为这类大字标语过于惹眼，难免引出些学究式的议论。

过去还有些家喻户晓的题词、口号，尽管也有欠通之处，却连学究也不议论。例如“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倘非金口玉言，拿到哪堂语文课上，都要当作病句的。然而怪的是大中小学师生员工全都一字不改地照本援引，进而象“满足已有成绩”一类句式也一字不改地见诸报刊，可见禁忌有连锁反应，伟人的差错也有人摹仿的。

不过，“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虽不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通顺，不大符合汉语习惯，意思还是大致不差的，不难索解。到了江青，则不但把历史上“左”的东西集其大成，推到极端，而且在花样翻新、乱提口号一点上也绝不后人。那个流毒全国的大规模“武斗”的号召，所谓“文攻武卫”，就是她的创造。我们有如条件反射，见此四字顿时如见刀光矛影，鲜血淋淋，反感于它的实质，也就忘了追究它根本是个不通的词组。这个不通的创造，是与同样概念模糊而后果严重的不通的口号“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等等一脉相承的。

“文革”已矣。滥提口号之风稍煞。不过一时一地也还免不了有些可疑的货色上市。去年报道某个工厂，报纸广播中一度提出什么“奖金下去了，生产上去了”，就属此类。盖出于个别记者“应时”“顺风”之作。虽然不是政策文件中语，

却借助于传播媒介，影响也不可低估。

冯英子先生小评街头招贴，却曾招来抗议信。可见批评不如捧场好听，但也可见各种标语口号不无值得推敲之处；同国计民生关系越大，越是要慎之又慎。其意义不限于咬文嚼字。好在今天禁忌毕竟已经渐少，上述一番妄论就是证明。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载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附记〕此文发表后，有一位读者来信，指出其中一段文字“揶揄有余，而诚实不足”，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确有语病，于是你写道，‘然而怪的是大中小学师生员工全部一字不改地照本援引……伟人的差错也有人摹仿的。’想必你也是过来之人，不知你当时是如何引用的，或是采取撰文、上书的方式，指出其语病，如果你不曾这样做，又何必以揶揄的口吻冷嘲别人呢？”

我写信感谢他的批评，并想在编杂文集时把他的信附发，征求他的意见。他复信说：“照我（上次去信）的看法，不是完人，就不能针砭时弊，这未免苛求于杂文作者了。因此，您出集子时，不必附我的信。对老百姓也是可以揶揄的，那就是在他们身上（我也有）的‘国民劣根性’，这种劣根性，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云云。

能听到这样诚恳的读者的坦率的意见，相与商榷斟酌，是受益不浅的。我以为杂文作者如果不能学习鲁迅那样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的风格，而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划脚地进行说教，恐怕写杂文将失去读者，做人也将失去朋友的。

# 标 签

你说杜甫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吗？我说杜甫是小地主。一句话打倒一个大诗人，就这么简单。这不是笑话。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本《中国人民文学史》，就用类似的“阶级分析”扫荡了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只保留了对民歌民谣和民间戏曲的承认。

各种方法中，形而上学方法最省力，它不用实事求是地作任何具体分析。贴“阶级标签”就是这样的方法。

除了“阶级标签”以外，还有一种“主义标签”。比如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等人就用“封资修”三字横扫了一切文化遗产包括当代文艺，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也都不过是标签而已。

先别“而已”！不止是“标签”而已，它还成了把人置于死地的帽子！



坏的“阶级”和“主义”的标签，是荆冠，好的呢，自然成了桂冠。连衣裙、长辫子属于“封资修”，该剪的剪，该改的改，如不自愿，强制执行。“红五类”则由出身一直“红”到服饰，要穿一身“国防绿”，才有“革命”的色彩。这也许不仅是标签，而是“包装”了吧。

荒诞的年代过去了。我们严肃地面对着恢复社会主义的声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也许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爱之深切，所以就把我们一切应该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标，不加分析地都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难免又出现了某些类似“贴标签”的现象。

例如不要随地吐痰，例如讲卫生、讲秩序、讲礼貌，我们归之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然而，这属于一般的公共道德、文化教养，不但无产阶级要讲，资产阶级也提倡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做出的成效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应该承认的，然则我们也要承认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么？

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强调“突出政治”的时期，常常把“政治”扩大化。随便贴“社会主义”（其实是假社会主义）的标签，为的是可以贴“反社会主义”的标签。今天的情况当然不同了，贴“社会主义”标签往往是为了动员

群众，比如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名义下禁止随地吐痰等等；但是由于把一些非政治性的行为人为地拔高到社会主义的原则高度，就难免事与愿违，极大地贬低了社会主义的崇高意义。

把社会主义降为廉价的“标签”，是一种庸俗化的宣传，为我们所不取。将以几代人的功夫担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重任的中国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要跨过庸俗化宣传的障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载六月四日《中国青年报》）

# 今天里的昨天

曾见报载市面上卖过玩具手铐，我没看到，不晓得销路可好。春天我在公园里碰上过一个小小孩，穿戴着从商店里买来的长袍马褂和瓜皮帽，所谓民族形式的童装。这种玩具和这种童装的设计者，想来不是为了“忆苦思甜”或别的政治目的，如此这般，恐怕主要是审美趣味以至文化水平的缘故。

刘邕有嗜痂之癖，海畔有逐臭之夫：历史上有名的。不过他们都止于自得其乐，没有向儿童少年推销。今天的设计者，即使只是造了手铐给自家的儿女，这种有损第二代、第三代身心健康的玩意儿也该受到谴责。自然，凡事都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些家长愿意给孩子买一身长袍马褂，倒也无关宏旨，不必谴责。而这种童装毕竟没能流行，可见乐于把孩子打扮成小“棺材瓤子”的父母总是个别的。

玩具、衣裳还是小焉者。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夜大学对新生“政审”的表格上，有一项“有何历史问题”；一家颇有影响的医院的基层党组织，为报考这个夜大的二十岁出头的孩子填写的是：“无重大历史问题”（？）！

这不是笑话，是实事。真是驾轻车而就熟路，一下子把人带回早已诀别的过去。可以叫作“今天里的昨天”吧。

乍一听，颇有点吃惊。但是读了在陕西凤翔发现隋唐殉人墓葬的报道，就恍然大悟。过去一向认为以人殉葬是奴隶制社会的标志，我国自秦代就废除了，隋唐已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一些地方居然还保留着奴隶制的旧礼陋俗，足见在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制度的彻底灭亡。

历史发展到社会主义新时期，也绝不意味着一切都已“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切封建制甚至奴隶制的胎记都已消失，一切沉渣从此永远不再泛起，先秦的髡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会以“剃阴阳头”的形式重现，六十年代的“样板戏”在八十年代余音不绝又有什么奇怪呢？

有些争议，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看来样板戏有它的爱好者和辩护者，近十年没得开怀欣赏，颇蓄下些不平之气，有点心痒难耐。但事实

上较多的观众和听众则表示“看够了，听够了”。最近报刊上有主张以调和来解决矛盾之论，试行一下，建议在县以上城市，包括北京在内，各辟一处演出点，专门日夜演出八个“样板戏”，有条件的地方全凭自愿组成“样板戏”专业团队（但不再恢复旧“样板团”特殊待遇），暂时搭不齐班子的可以放映“样板戏”影片，使“样板戏”酷爱者不必羞羞答答地在晚会、广播、电视中去欣赏片片断断甚至抹掉戏名的唱段，而能沉浸其中，陶醉于“今天里的昨天”。也是各享其乐，各得其所；若干年后，有另一个陈建功出，也许会搜寻八十年代这个角落里的浮沉哀乐，写出另一篇社会风俗画式的小说《找乐儿》来。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载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文艺报》）

## “粉碎”和“彻底否定”

读古华访问联邦德国的纪行文章，他记下著名社会学家、作家恩格尔曼先生的一段谈话。

来访者问起，德国是一个具有发达的科学文化的国家，历史上出现过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为什么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竟出现了疯狂的纳粹法西斯主义，致使全世界都陷入了一场大战，也把整个德意志民族投入了苦难的深渊？

恩格尔曼先生沉思一会才说：“你们提出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德国、欧洲、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写了几屋子的书，都没有完全探讨清楚的问题……”他提纲挈领地作了一些分析，这里不具引（读者可参看湖南《文学月报》今年第六期）。

来访者又问：纳粹主义还有可能在德国死灰复燃吗？

恩格尔曼说：“我的大半生的奋斗，我的几乎是全部的著作，都是在探讨和回答这个问题。”大战结束时，他二十四岁，在达豪集中营，那时大家都不愿考虑法西斯的问题。他访问了一百二十多位当年的当事人，有的热心支持法西斯主义，有的反对，有的满不在乎；他把访问结果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最高勋章》这本书。他还陆续写了《我们曾经是奴仆》、《没有犹太人的德国》、《追捕残余纳粹》等著作。

对于纳粹的研究，是这一位专家“大半生的奋斗”、“几乎是全部的著作”呀！是德国、欧洲、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写了几屋子的书，都没有完全探讨清楚”呀！

是西方世界小题大做吗？是西方学者不得要领吗？按照我们习惯所形成的看法，不是什么组织什么会议做一项决议，或是由一位什么权威人物署名发表一篇结论性的文章就足够了么？

中国的“文革”也许不能同德国的纳粹简单地相提并论，其祸国殃民造成历史大倒退则一。然而我们在剥夺了江青集团的领导权力之初，就宣布“四人帮”已被“一举粉碎”；而长达十年、渊源有自的“文革”，似乎也轻而易举地被我们“彻底否定”了。

“粉碎”而不过“一举”，“否定”且臻于“彻

底”，真象是“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那么潇洒。不过生活并不是诗，我们恐怕不能过分沉湎于语言的魅力。

哲学上的否定不等于法庭上的宣判。恩格斯就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我想，以否定“文革”为例，也不是学习一下文件，统一一下认识，开会、表态、喊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不管什么问题，更不必说涉及政治体制的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状，以及千百万人传统观念、文化心理背景的问题，都不能靠“走过场”来解决。

把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复杂化固然不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对待也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为了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必须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方面改革的对象，不仅是“文革”中暴露的痼疾，而且更有那导致“文革”的种种弊端。

经过一场巨大的灾难后，我们的民族要摆脱缺乏思辨的状态，成为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自觉的自为的民族。对于“文革”及其根源的历史反思，是一个全民族总结经验的集体认识过程，



这也将是我們据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集体实践过程。在这个长过程中，不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专家学者，而且一切爱国的、有志于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有贡献自己才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以为。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三日

（载《群言》一九八六年第八期）

## 漫谈“经典”

把一些开创性的思想家叫作经典作家，把他们的著作称为经典著作，记不清是由什么时候开始的了，可能还是从国外沿袭而来。这在外文的语义我不知道，但在汉字上却透出某种宗教气息。

儒道两家原先都不是宗教，但圣经贤传也无不罩上宗教式的神圣光环。儒家由四经五经六经而十三经，道家有老子《道德经》、连非圣无法的庄子的著作也被后世崇拜者奉为《南华经》。于是，儒、道跟释氏佛家鼎足而三，并称三教了。

孔子留下经典，儒家定于一尊，也就化为清规戒律般的干巴巴、硬梆梆的教条；而在近于政教合一的条件下，教条几乎就等于刑律。哲学观点并未超出儒家体系的李贽，由于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自然无异于亵渎神明，触犯刑律，不但不能见容于当时的思想界，而且不见容于人世，非死不可了。

小时候到庙里逛过，也从大人那里听说，和尚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念经。从早到晚，照本宣科，念念有词，不求其解，但是如果念错，脑袋是要被大和尚当木鱼敲的。长大以后每见经典二字，往往条件反射似地滋生反感，我猜多半源于这个印象。

十几年前“文革”中，滥竽充数地“念经”不说了，有一回被责令单独背诵“语录”十三页第二条，我记得是：谁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云云。不料被叱重背者再三，我以为自己没有错，再三这么重复。后来才知道，我是错把原文中的“什么人”记做“谁”了，而语录摘自“经典”，这在当时是可以视我为“篡改”的。从此更加唯恭唯谨，如履薄冰，并且暗自感谢语录体的倡导者，因为片言只语，毕竟还好记诵，若是动不动叫默读全篇宏文，那可真要命了。

那时候报刊文章多半由语录串成，语录部分一律用黑体字排印。有一次见有孤零零一句黑体字，不知是什么警句，仔细端详，竟是“该轮到  
我捞一把了”，不禁瞠目结舌良久。这原是列宁文中的一句引语，只因为列宁这段文字收入了张春桥编选的关于专政的语录，也就得到排印黑体字的殊荣。

由此乃知上了经典的，“谁”和“什么人”不

能通假，一字不得更易；上了经典的，句句都是真经，就连“该轮到我来捞一把了”也跟着沾光。过去的宗教或许也是这样对待经典的吧，而在“文革”的造神运动中却把这种迷信推到了荒诞的极端。

李白《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古时候“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学究，那书呆子形象是可怜的。而今之某些寻章摘句者却不是可怜的形象了，盲目相信了他们那一套的，才是书呆子或天真上当的人。张国焘对工农干部演讲，象煞有介事地说：“马克思说，‘无风不起浪’。”这是装腔做势，借以吓人，装点门面，以售其私。王明言必称马列，可算“学院派”，尽管某卷某页，如数家珍，而决策万里之外，却是祸殃民。到了林彪，创“顶峰”说，倡“捷径”论，肢解马克思主义，零售毛泽东思想，喊得最凶，引得最多，不过大家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歪嘴和尚把经念歪的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在“文革”中，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受了一场浩劫，现在正以它不是穷尽真理而是开辟认识真理的通路科学世界观本来面目回到人们中间，在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同时葆有常新的活力。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不能要求紫罗兰和玫瑰花有同样的色彩和芳香的睿智的话，论证和预言了“百花齐放”的必

然，而这正是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教条、编作语录的人所从来不曾摘引过的。一边标榜对“经典”的忠诚，一边搞“为我所用”，借“经典”以营私者，充其量也就是忠于自己吧！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四日

（载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